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命

局書國中蘇

輯一第書叢習學部幹

命 革 與 家 國
著 者 列



售經局書國中折

國家與革命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著者 列
經售者 新
中
風
書
局 等

北平 鄭州 濟南 濰縣 安東
天津 洛陽 長春 大連
石家莊 開封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哈爾濱

.....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連印造

目次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一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五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九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	三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三
二 革命底總結.....	六

283540

三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三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 馬克思底分析

一 公社社員底企圖底英勇精神何在？ 完

二 用什麼來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呢？ 四

三 代議制的消滅 五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五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六

第四章 恩格斯底補充說明（續上）

一 「住宅問題」 六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六

三 給培培爾的信 七

四 「愛福特綱領」草案底批評 七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而作的序言 八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之被廢除 八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24
-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108
- 三 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 109
- 四 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 111

第六章 機會主義者之糟蹋馬克思主義

- 一 普列哈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113
 -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115
 - 三 考茨基與班業吉克的論戰…………… 117
- 初版書後…………… 117
- 註釋…………… 117

國家與革命 (註一)

初版序言

國家這個問題，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現在都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地加速並加劇了由壟斷資本主義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註二）。與有莫大權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融合起來的國家，其所加於勞動羣衆的異常嚴重的壓迫，也日益嚴重起來了。先進各國（我們這裏是指它們的「後方」說的）都變成工人們底軍事苦役的監獄了。

遷延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未聞的悲慘與災難，使羣衆的地位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憤恨加強起來。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起來，它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就有實際的意義了。

由比較和平發展底幾十年代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底原素，在全世界各國正式的社會主義黨裏面造成了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國家主義的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普列哈諾夫、波特列索夫、勃列什科夫斯基、路班諾維契，以及形式上稍許掩蓋着的蔡雷特利先生、威爾諾夫先生和他們的同僚；在德國有：謝得曼、李謹、達微特；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蓋德、萬德威爾；在英國有：海德曼和費邊派諸如此類等等），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國家主義，其

特點就在「社會主義」底「領袖們」不僅對於「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的」國家底利益，表示卑躬屈節的適應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列強已經把很多的弱小民族剝削並奴役得好久好久了。帝國主義戰爭恰恰就是分割和重分這種贖物的戰爭。爲使勞動羣衆從一般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從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這種鬭爭，如不與機會主義對「國家」的偏見作鬭爭，是沒有可能的。

我們本書中首先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特別要詳細地講到這種學說被人所忘記了的或遭受了曲解的那些部分。其次我們特別來研究曲解這個學說的主要的代表考茨基——在這次大戰時期中遭到了可憐的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之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把俄國一九〇五年、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經驗，做出主要的總結。後面這一次的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中旬〔初旬〕）大概正在完結它的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的來講，整個的這次革命，只有把它當作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鎖鍊中的一環，才可以明瞭。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不僅是具有實際的政治意義，而且還含有最迫切的意義，因爲這個問題是向羣衆說明，他們要把自己從資本底羈絆之下解放出來，在最近的將來，應該做些什麼。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幾乎沒有改變。其中僅僅增加了第二章第三節。

著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號（十七號）於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許多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底學說，歷史上數見不鮮的遭遇一樣。大革命家常常畢生受着壓迫階級的虐待；他們的學說常常引起了壓迫階級切骨的痛恨，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當他們死了之後，人們便企圖把他們奉爲有害的神像，頌揚他們，表彰他們的名字，來「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刪除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這個學說底革命鋒銳，糟蹋這個學說。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來「製造」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忘記着，拋棄着，曲解着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分，提在第一位，而加以頌揚。所有社會國家主義者，現時都儼然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却在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了，他們以爲這個馬克思爲



進行劫掠式的戰爭訓育好了極有組織的工會！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首先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的學說。因此我們便不能不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中引出許多長篇大段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文，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指引，是萬不能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全部章句，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章句，必須盡可能地充分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夠獨立地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底見解底總和，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證據確鑿地證明出來和一目瞭然地顯露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講起。這部書底第六版是一八九四年在斯都德牙爾出版的。我們必須從德文原版中翻譯出引句，因為該書的俄文譯本為數甚多，其中大半不是譯得不完全，便是譯得極不好。恩格斯在總結他的歷史分析時說道：

「國家絕不是從外面來強制社會的一個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實體」或「理性底外形和實體」（註三），國家是什麼社會發展到某個階段上的產物；它是社會捲入了自己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抗而又無法擺脫時的表現。而

爲使這些對抗，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鬭爭中互相消滅，並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底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觀念，十分明確地表示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產生底地點和時間，就是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點和時間，因爲階級矛盾是客觀上不能調和的，所以國家也就會產生出來。倒過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却正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觀點上開始的。這種曲解分成兩個重要的派別：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爲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只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這樣來「修正」馬克思，說國家便是階級調和底機關。按馬克思底學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能發生，亦不能存在。而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大學教授們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呢！）則以爲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按馬克思底學說，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

壓迫別一階級的機關，它建立一種「秩序」使這種壓迫成爲合法的，並使它鞏固起來，同時以緩和階級底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就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爲緩和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打倒壓迫者的一定的鬭爭工具和辦法。

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作用的問題，恰恰成了非常嚴重，成了立刻行動，而且是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問題，此時所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一齊完全傾向於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了。這兩個黨底無數的決議案和兩黨政治家底論文中，充滿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不能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起來，——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絕對不能了解的。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極明顯地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並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常常指明了的），而是些些類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之曲解馬克思主義，更爲巧妙。它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站在社會之上而「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和體現這個

「疎遠」的國家的政權機關，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是馬克思從革命任務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上所得的一種最肯定的結論，在理論上已十分明白，而考茨基……所「忘記」了和曲解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盡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

「……國家與宗法的（氏族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不同之點，第一就是它依照地域來區分其治下的人民……。」

這樣的一種區分，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它會與宗法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作了長期的爭鬭之後，才發生出來。

「……國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社會政權底建立。這個政權是和那個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民衆，已經不能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權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了……。這個社會政權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的。構成這個政權的，不僅有武人，而且還有物體的附屬品，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的機關，——這些都是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更闡明命名爲國家的那個「力量」——由社會產生出來，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主要地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特殊的武裝隊伍，這些隊伍，還握有監獄等等。

我們其所以有權說特殊的武裝隊伍，是因爲一切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政權是與武裝人民，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不能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像其他一切革命思想家一樣，盡力使覺悟的工人們，來注意盛行的、一般庸人所認爲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爲堅如石玉的偏見所奉爲神聖的那個事實。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之主要工具，——難道這能够不是這樣嗎？

在十九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底眼中看來（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親身經過，也沒有親眼看過一次偉大的革命），確實這不能不是這樣的。他們根本不了解「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是什麼。西歐和俄國的庸人，對於何以需要超出於社會之上而與社會疎遠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警察和常備軍）這個問題，一味假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底三言兩語，憑藉什麼社會生活複雜，什麼職權底分配*一類的話，來作答覆。

這樣的憑藉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成爲

就是說，社會上的分工，在此地是指行政、軍事等等之分立。

——編者

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這個事實。如果社會上沒有這樣的一個分裂，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其別於使用木棍的猿猴，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部落社會的人們之原始的組織，只在其組織底複雜程度上，在其技術底高度上，但這樣的組織，總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成爲不可能，是因爲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了，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便會引起它們之間的武裝鬭爭。國家就此形成起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裝隊伍，也就由此造成出來；同時破壞國家機關的每次革命[※]，明顯地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企圖恢復爲它所御用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如何努力企圖創造這樣的新組織——不是爲剝削階級而是爲被剝削階級所御用的新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一段議論中，已經從理論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每次大革命都把這個問題切實地明顯地而且以羣衆行動底大規模形式在我們面前提出來。我們以後將看見這個問題在歐洲和俄國革命底經驗中怎樣具體地表現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再來研究恩格斯底敘述。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有些地方）這個社會政權是薄弱的（他這裏所講的只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和北美洲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在自由的移民佔優勢的那些地方），但是一般的講來，這個政權是在加強起來的：

「……社會政權，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增大與其人口之增加，而加強起來的。試拿現在的歐洲來觀察一下就够了，這裏階級鬭爭和侵略競爭，把社會政權增到了這樣高的程度，它竟有併吞全社會，甚至併吞國家的危險了：。」

這一段文字至遲不過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作於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此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托拉斯底完全統治，最大銀行之握有一切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在法蘭西還只初步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甚至更要薄弱一點。從那時起，「侵略競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列強所完全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地增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贖物的強盜戰爭，致使社會所有的力量被掠奪的國家政權所「吞食」的過程，走近完全的崩潰的局面。

還在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恩格斯就能够指出「侵略競爭」，是大列強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特徵之一，可是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當這種競爭已經加劇了許多倍而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國家主義底混蛋們，却利用「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的鬼話，

* * *
即「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

* * *
在原稿上是：「偉大的革命」。

——校者

——編者

來遮掩他們祖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強盜的利益了！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支持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政權，便需要賦稅國債。恩格斯說：

……「官吏們掌握了社會政權和徵稅的權利，他們便成爲駕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部落（氏族）的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夠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法律也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小警察員，其「威權」要大過部落社會的代表；可是甚至文明國家底軍事首領，一見了部落酋長所享受的那種「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底敬意」，也就要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已經講到關於成了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們底特權地位問題。同時指出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考茨基又怎樣反動地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既然國家是爲要控制階級對抗性而發生的；既然它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便是最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底國

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並且由此獲得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懂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也可以遇到例外的情形：這就是有這樣的時期，那時閉爭的階級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情形，使國家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暫時得到一種相當的獨立性，表面上鬚髯是這兩階級間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君主專制政體，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和德國的俾斯麥，都是這樣（註四）。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俄羅斯共和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這樣——當克倫斯基政府已經開始壓迫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領導，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來直接解散蘇維埃，此時的克倫斯基政府，就是這樣。

恩格斯繼續說：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財富間接地但因此却更可靠些地運用它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之間的聯盟』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已經在所有民主共和國中非常巧妙地把這兩種方法，發展

了」，以擁護並實施財富底全部權力。舉例來說，如果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初創的頭幾個月當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在聯合政府中巴爾欽斯基先生對於一切約束資本家和防止他們掠奪行爲，以及阻止他們在軍事供給上盜竊國庫的種種方法，都實行怠工；如果巴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巴爾欽斯基相同的人來代替他的），他就從資本家方面獲得每年十二萬盧布薪俸的位置，以爲「謝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卡的資本家們的聯盟呢，或「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奧克遜切夫輩與斯可比列夫輩底作用究竟怎樣呢？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抑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底全部權力之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爲它不依靠着資本主義惡劣的政治外形*。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最好的可能的一種政治外形，所以資本一經握住了（經過巴爾欽斯基輩、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等等）這一種最好的外形，它就很可能，很有把握地建立自己的政權，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無論何種人物、機關或政黨之變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爲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很明顯地估計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久長的經驗，同時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這種制度在現代的國家中，不能而且永遠不會給予再大的結果。」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們——西歐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普選制都正是希望着「更大的結果」。他們自己起一種妄念，而且用這種妄念去鼓動民衆，以爲普選制「在現代的國家中」真正能够表現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意志，而且能够「保證這種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一種妄念，只能指出：恩格斯底十分明顯的、確定的和具體的申說，在「正式的」（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底宣傳和鼓動中，到處都被曲解。以後，我還要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現代」國家的見解，那時我們將詳細地說明此地恩格斯所駁斥的這個觀念底全部虛偽性。

恩格斯在他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作了一個總結，其詞如下：

「於是，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過沒有國家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裏面，簡直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在經濟發展底某一個階段上——這個階段必須與社

* 在原稿上說：「與政治機體之何別缺點」。

——編者

會之分爲各階級的分裂有連帶關係——國家就因這一個分裂而成爲必要了。我們現在正在快步地行近到生產發成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此等階級不僅再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底直接障礙。將來階級之歸於消滅，正與過去它之發生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階級已經消滅，則國家也必然隨之而消滅。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基礎之上，按新的方法而組織生產的社會，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最適宜於它的地方去：就是送到古品博物館中去，與紡織車和黃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文字，在現代社會民主派的宣傳和鼓勵的作品當中，是很難得遇見的，即使有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他們也往往似乎是崇拜偶像，就是說，對恩格斯表示一種正式的敬意，而絕對不想去思考一下，「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古品博物館中去」，先要有何等深刻而廣闊的革命。他們甚至常常不懂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是什麼東西。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衰亡」的言論，既然負有這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多，而且這樣明顯地指出了機會主義爲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慣技底本質何在；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言論應該加以詳細的討論。現在我們把這段言論全部照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可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它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身，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的對抗。同時就連國家都消滅了。」在階級對抗中進展着的社會——過去以及現今所存在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就是說，必需有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生產底外部條件，特別是強力地來迫使被剝削階級在現存生產方法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如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以內去過活。國家曾經是整個社會底正式的代表，是社會之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只是因爲它是某一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在當時是單獨地代表整個社會的：在古代，它是奴隸主（國家底公民）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到了最後，當國家真正變成全社會代表的時候，它（國家）本身便使自己成爲廢物了。一旦沒有任何一個應被壓迫的社會階級，一旦跟着階級統治之消滅，和由現代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各個生存競爭之消滅，同時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過分行動也一起消滅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東西要壓迫，也無需乎特殊的壓迫力量的國家了。國家真正以全體社會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個行動——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國家）的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不需要，而無形中自然泯沒了。此時管理物品的機

隨和指導生產過程的機關，便來代替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衰亡的。我們應該站在這個觀點上來估量「自由人民國家」這一句話，這句話在鼓勵的意義上可以暫時存在，可是從科學意義上講來，它是不能成立的。同時我們應該站在同一的觀點上來估量一晝夜間廢除國家的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要求。」（見恩格斯著的「駁杜林」，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具有極豐富的思想的議論中，現代各個社會主義黨所奉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衰亡」，以別於「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的學說而已。這樣的截斷馬克思主義，這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這樣的「解釋」，僅僅是留下了「一種模糊的印象，以爲只有緩緩的、平順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怒潮，沒有革命。對於國家「衰亡」之一般流傳的風行一時的了解，顯然是抹煞革命，——如果不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最魯莽的曲解馬克思主義，這種曲解只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而在理論上是由於忽略恩格斯底「總結」議論（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出來了的）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論點和理由。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底起頭幾句中就說，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它「即此便消滅國家

之爲國家」。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一般人都沒有加以思索。尋常一般人對於這句話不是完全置之不理，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學派的」『弱點』。可是實際上在這幾句話當中，已經簡潔地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底經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表示出來了。關於這次革命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更詳盡地來討論。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至於他所說的關於國家『衰亡』的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的。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衰亡』，而是革命中被無產階級所『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之後，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就會衰亡的。

第二，國家是『特殊的壓迫力量』。恩格斯這個巧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此地完全明顯地說出了。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少數富豪對千百萬勞動者的『特殊的壓迫力量』，是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特殊的壓迫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的。『消滅國家之爲國家』便在於此。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很明顯的，以另一個『特殊的力量』（無產階級的）來代替一個『特殊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這樣的更換，是絕對不能以『衰亡』的形式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十分明顯而確實地用『衰亡』二字，甚至更特出和鮮明地用『湮沒』二字的時侯，他是指在『國家以全體社會的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之後，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

那個時期而言的。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候「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在無恥地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此處是同時講到民主制底「沒」和「衰亡」。這一層看來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那些「不解」這一點的人，只是因為他們不會思索到，民主制也是國家，因此，一旦國家無形消滅，民主制也隨之而無形消滅。只有革命才能够「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一般的國家，就是說最完滿的民主制，只能自行「衰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立論，說「國家是自行衰亡的」，同時，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立論是用來反對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國家衰亡」這個立論中演繹出的結論，用以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我們可以擔保說，曾經讀過或聽到過國家「衰亡」的論調的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八人完全不知道，或是不記得恩格斯從他這個立論中所得出來的結論，不僅是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或許有九個人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爲什麼向這個口號進攻，便是向機會主義者進攻。歷史就是這樣記載出來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的被人暗中假造爲流行的庸人三益了」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千萬次地重述了，糟蹋了，印入了一般人的頭腦中而爲最簡化的東西，成了很鞏固的偏見。可是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

人抹煞了而且「忘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派底政綱的要求和流行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當中，除了對民主制概念之小資產階級性的誇大的描寫以外，便沒有一點政治的內容。既然人們在這個口號中含法地暗示了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曾經站在鼓動的觀點上準備「暫時」替這個口號作『辯護』，但是這個口號確是機會主義的，因為它表示了不僅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加以粉飾，而且不了解社會主義者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承認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之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一切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特殊的壓迫力量』。因此一切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再三地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了。

第五、在恩格斯底著作中，大家記得他關於國家衰亡的議論，但在同一著作中，還有他關於暴、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把這種革命作用之歷史的估量變成了對暴力革命之真實的頌揚。這一點『沒有一個人記得』，在現代各社會主義黨中對於這一種思想底意義不肯談論，而且甚至不肯加以思索；而其在羣衆中的日常的宣傳和鼓動中這種思想簡直是不發生任何的作用，可是這種思想終究同國家底『衰亡』是不能分離地密合成爲一個和諧的整體的。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

「……暴力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作用（『除了造惡之外』），就是革命的作用；據馬克思底意見，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一個新社會的胎胞的時候，暴力便是這個舊社會底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的道路和破毀腐舊死僵的政治形式的一種工具——凡此一切，杜林先生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推翻剝削者的經濟計，暴力也許是必要的——可惜！——，因爲一用暴力會使應用它的人敗壞德性的！雖然每次勝利的革命之後常有那種道德上知識上的極大的進步，他終竟說這個話了！而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民衆也許不能不進行暴力的衝突，而在德國發生這個衝突至少可以獲得這樣的利益：就是說，至少可以打破因三十年戰爭*之失敗而滲透在國民意識中的一種奴隸精神。而杜林那種黯淡的、凋零的、無力的、僧侶的思想，何敢提出到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註五）中來？」（見『駁杜林』，德文第三版，第二編第四章第一九三頁）

怎樣可以把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這是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就是說，至其死的那一年）曾經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來與國家「衰亡」底理論相併合而成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藉折衷主義來把它們併合起來，用無原則的或詭辯家的方法任意抓住（藉以取惠於

黨權者）其中一種議論，有時取其前者，有時取其後者，而且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就算不再多的話）恰恰是把國家『衰亡』的理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是現代正式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最慣用的最普遍的現象。這樣的一種代答，自然不是新發明；我們就在希臘的古典哲學史上也看見過了。當人們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機會主義的時候，把折衷主義偽造為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羣衆，能夠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它顧及到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以及一切矛盾的影響等等；可是事實上它沒有給任何一個對於社會發展過程之完整的、革命的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的，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還要更詳細地說明。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之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不能用『衰亡』的方法，而按通例，唯有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才能實現。恩格斯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是完全同馬克思屢次所宣佈的言論相符合的（我們還記得『哲學之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個著作底結尾，在這裏會公開地揚言暴力革命之必然性。我們又記得，約及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在這部書裏面他毫不

* 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是德意志的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的宗教戰爭。

譯者

姑息地對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加以鞭撻）——這一種頌揚，絕不是一感情衝動，絕不是誇張其詞，也絕不是論說伎倆。必須有系統地用這種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而且唯有用這種觀點來訓練羣衆，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學說之基礎。現在極盛一時的社會國家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之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其特別鮮明的表現，就在於這兩種思潮忘記了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

沒有暴力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國家之消滅，即一切國家之消滅，除了任其「衰亡」之外，便沒有別的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個個別的革命的形勢，分析每一個個別的革命經驗之教訓的時候，會詳細地、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在下面來研究他們學說中這一個顯然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經驗

一 革命的前夜

成熟了的馬克思主義之最初的著作——『哲學之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正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夜出現的。由於這個事實，所以在這些著作中，除了闡述馬克思主義底一般原則以外，在相當程度內還有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底反映。因此在我們探究這二部著作底作者在他們從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經驗中做出的結論以後，來考察他們關於國家的一切言論，也許是較為適宜的。

馬克思在『哲學之貧困』裏說：

「……工人階級在發展底過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沒有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底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真正的政權，因為正是政權，才是資產階級社會中階級對抗之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出版的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我們拿這冊關於階級消滅之後國家便無形消滅的觀點之一般的解釋，來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解釋比較一下，是很可注意的。

「當我們研究到無產階級發展一般的階段時，我們看見了現社會中那種比較隱蔽的內戰，直至這種內戰變成了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以暴力推倒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工人革命中之第一步是變（原文是：「提昇」）「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獲得民主制。」」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逐漸地把全部資本由資產階級方面奪取過來，把所有的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裏，就是說，集中到組織成爲一個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地來迅速增加生產力底總量。」（一九〇六年的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三七頁）這裏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中最出色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之後所開始常說的）之思想底公式。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底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馬克思主義中「被人忘記了的話」。

「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這個國家底定義，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底流行的宣傳和鼓動的作品中，不僅從來未被加以解釋，而且簡直被他們忘記了，因為它與改良主義完全不能調和，而同一般機會主義的偏見和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所謂「民主之和平發展」，是直接相衝突的。

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國家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衆口一詞地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而且肯定地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可是他們「忘記」補充，按照馬克思底意思：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正在衰亡的國家，就是說，組織起來便立刻開始衰亡而且不能不衰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需要的是「國家」，「就是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力量之特殊組織，是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底組織。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那一階級呢？自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需要國家，僅僅是爲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但是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這個鎮壓而使之實現；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革命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能够聯合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來作反抗資產階級的鬭爭，把資產階級完全剷除。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來維持剝削制度，就是說來謀極少數人底自私的利益，反對大多數的人民。被壓迫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來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就是說來謀大多數人民底利益，以反對現代極少數的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夢想以階級調和來代替階級鬭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

義改造的見解也是幻想的，他們以爲這個改造不是用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方法，而是用少數人之和平的服從已經明瞭自己責任的多數人的方法來實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和承認超階級的國家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系的，在實際上，這種烏托邦的結局是叛賣勞動階級底利益，這已經爲歷史所證明了的。例如一八四八與一八七一年的法國革命史（註六），以及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之參加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的資產階級內閣的事實（註七），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馬克思曾畢生盡力與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它現在由俄國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所復活）奮鬥。他澈底地引伸階級鬥爭的學說直到政權的學說，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爲它是一個特別的階級，它是生存底經濟條件養成它去完成這個責任，給它完成這個責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同時它却聯合起、團結起、組織起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規模生產中的經濟作用——能够領導一切勞動的和被壓迫羣衆，這些羣衆受資產階級之壓迫和剝削往往較之無產階級有增無減，可是他們却不能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爭鬥。

馬克思所用於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必然要歸結到承認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承認不讓任何人分享而直接依靠羣衆武裝力量的政

權。只有把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才能推倒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能够把資產階級之必然的拚命的反抗鎮壓下去，而組織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以建設新的經濟制度。

無產階級必須有國家政權，力量的集中組織，暴力的組織，以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以領導廣大的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佈置』社會主義的經濟。

馬克思主義訓練工人的政黨，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够奪取政權，引導全體人民走到社會主義，指揮和組織新的制度，並且使它能够在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之建設事業中，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之教師和領袖。反之，現在正得勢的機會主義從工黨中訓練出離開羣衆的工人較優的工人代表，這些代表在資本主義之下『營謀』安適生活，爲着一飯之惠而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就是說，放棄反對資產階級的民衆之革命的首領作用。

『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所有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之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系。這個作用底實現，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力底特殊的組織，那末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先打破和毀滅資產階級爲自己而設的國家機器，則創造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的組織是不可能。『共產黨宣言』幾乎說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

時，便說到這個結論。

二 革命的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其『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著作中，得出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革命的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在經歷艱苦的道路。它正在有條理地執行它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完成政變的日子。（註八））『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底一半，現時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後半。它首先完成立法權，以獲得推翻它的可能。現在它已達到了這個目的，它便來完成行政權；使這個權力變成爲最純粹的形式，並使之孤立，使之與自己對立成爲唯一的受攻擊的中心，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它』（着重點是我加的）。『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後半部的時候，歐洲便會站起來歡呼：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有無數官僚和軍隊的組織，有種種複雜的矯揉造作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和五十萬軍隊；這個可怕的寄生蟲、液體，密網般地籠罩着整個的法國社會，阻塞着它通體的氣孔，產生於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壞（且它加速了這個崩壞）的時期』。法國第一次革

命發展了集中制，『但是同時却擴大了國家政權底容量，屬性和輔助機關底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機關』。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註九）『除了很大的分工外，什麼新的東西都沒有增添出來……』

最後，代議制的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鬭爭中，除壓迫底辦法之外，已經不能不加強國家政權底手段和集中。所有的政變都使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着重點是我加上去的）。『那些相互更替爲着取得統治權而鬭爭的政黨，都把這個巨大的國家建築物底奪取，視爲自己的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在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出色的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裏，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共產黨宣言』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抽象，在最普遍的概念和詞句中表現出來。在後一著作中，這個問題就提得很具體，而且做出格外正確、肯定、實際而明白的結論說：過去一切的革命，都使國家機器臻於完善，可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碎它，破壞它。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之主要的、基本的地方。而正是這個基本的地方，不僅被勢盛一時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所忘記了，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地曲解了（我們以下要說及的）。

在『共產黨宣言』上作了歷史底一般的總結，這些總結使人們不能不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獲得政權，不得到政治上的統治，不把國家變爲『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在它勝利之後馬上會開始衰亡，因爲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是不需要的，並且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還沒有提到（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其方式應當怎樣的這個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所提出並解決了的正是這個問題*。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底哲學的馬克思，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個偉大的革命時期之歷史經驗，來做他學說底基礎。此處也像平常一樣，馬克思底學說是由深刻的哲學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之總和。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於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和在被壓迫階級獨立的鬥爭面前，國家機器底變遷如何，它的進化如何？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又有什麼任務？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政體崩壞的時代。這個國家機器所最特別的兩種機關就是：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個機關是千頭萬

* 此地是指上述的馬克思的著作：『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緒地恰恰與資產階級相聯系着。每個工人底經驗能把這種聯系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階級在其切身的經驗中學習認識這一個聯系；因此工人階級這樣容易地明瞭並且這樣穩固地領會這種聯系之不可免的理論，——對於這種理論，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是不識時務地和輕意地否認它。便是更輕意地「一般地」承認它，可是忘記做出適當的實際的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破壞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但是恰恰又是「塞住」生命所關的氣孔的寄生蟲。現時盛行於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的考茨基式的機會主義，認為這種把國家當作寄生的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僅有的特性。自然這樣的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極端頑固社會主義而把「保護祖國」的觀念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來擁護和掩飾這個戰爭的小資產者，是很有益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自從封建制度崩壞之日起，歐洲有了許多資產階級革命，經過這些革命，這個官吏的和軍事機關，便發展、完成和鞏固起來。部分的說，正是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且受其支配；其所用的方法大半就是利用這個官吏與軍事機關把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底上層分子安頓到比較舒服、安靜和尊榮的地位上去，把這些地位底佔有者抬到人民之上。我們試看一看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之後，在半年中所發生的事件：以前寧肯給黑派佔有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孟塞維克和社會民主黨人底贖物了。他們實際上

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他們努力把這些改良延期到『立憲會議』，而同時又把立憲會議倫敦的延期到戰爭底結束再說！但是對於瓜分贖物，佔據各部總長和副總長、將軍、省長等等位置，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候任何的立憲會議！聖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實質上不過是全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去瓜分重分贖物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九日（八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結果，客觀的結果，毫無疑義的是：把改良事業都延期了，官吏位置都瓜分好了。在瓜分中的『錯誤』也因幾次重新瓜分而改正了！

但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如以俄國爲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之間『重新瓜分』的事件愈多，則一切被壓迫階級，以及領導它們的無產階級，便愈明白地認清他們對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可調和的仇視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的政黨，甚至最民主的政黨——而『革命民主的』政黨也在內——就必然的要加強壓迫，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並且鞏固壓迫機關，就是說，還是鞏固那副國家機器。事變底這種過程逼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抗國家政權，使它認定任務，不是改善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破壞它，毀滅它。

任務底這樣決定，並不是得之於邏輯的推論，而是得之於事變底實在的發展，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活的經驗。馬克思堅持歷史經驗底事實基礎，其嚴格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從下面的

事實中看出來：他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地提出拿什麼來代替那必須推倒的國家機器這個問題。當時的經驗還沒有給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去。在一八五二年，只能根據自然的歷史的觀察來很確切地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達到了要『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以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破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此處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爲公理，把它們移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這是否正確呢？爲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的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中所作的序言裏說：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中歷史上的階級爭鬥較之其他各國都要澈底些，每一次鬥爭都達到了決絕的終點。這個階級鬥爭所由進展以及它的結果所由表現的變化不居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爲特色。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以後，它是一個純粹的等級的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撲滅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資產階級底統治，此種制度所具有的標本式的明顯性，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及；同樣，法國正在拾頭的無產階級反對正在統治着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其形式的尖銳亦爲其他各國所未見。』（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現在已經陳舊了，因為自從一八七一年以來，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圖爭中發生了停頓，雖然這個停頓不管它的期限如何久長，但絕對不能說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就沒有成爲階級爭鬥堅持到底的模範國之可能。

現在我們試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的歷史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過程發現於更廣大的舞台上，進行比較遲緩而且複雜：一方面，制定「立法權」的不僅在共和國（法國、美國、瑞士）而且在君主國（如英吉利，在相當程度上的德意志、意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等等），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底「贖物」的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爲搶奪政權而爭鬥，同時，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毫無變動，最後，「行政權」以及它的官吏和軍事機關，都完善並且鞏固起來了。

毫無疑義的，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切最新的進化底普通現象。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中，法國在迅速的，銳利的，集中的形式中，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有的那些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財政資本時期，偉大的資本主義壟斷時期，壟斷資本主義之轉變爲

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西歐文藝復興時代，其特點就是：古典藝術與古典文學之復興；科學創造之高漲；思想與人格之解放；封建制度之崩壞以及教堂權威之衰落。

——校者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因「於無產階級的壓迫加強了，故表現着『國家機器』之異常加強，官吏和軍事機關之空前的增長，這些現象無論在君主國裏與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都是一樣。

世界歷史現時無疑地進到一個比一八五二年還廣大得多的階段，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用什麼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對於這個問題『巴黎公社』已經供給了最豐富的材料。

三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一信的摘要披露於“*Neue Zeit*”，**（第一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上，那封信裏却有下面一段出色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現各階級間之鬭爭的功勞都是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老早就敘述過階級鬭爭底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各項：

（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所特有的一定的歷史上的爭鬭相聯系着的（*historische Entwicklungsstufe der Produktion*）；（二）階級爭鬭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三）

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到無產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面，馬克思極鮮明地表示了：第一，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有重要的根本的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一般人常常說馬克思學說中之要點便是階級鬥爭。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從這個錯誤中往往就發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改造馬克思主義，使之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因爲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創造，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造的，一般地說來，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僅僅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許是未脫離資產階級之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政策之圈套。以階級鬥爭的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裁切了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爲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眞正了解和承認。當歐洲底歷史使工人階級實際上去解決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

* 本節是再版時的補作。

——編者

* 『新時代』，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

——編者

都變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毫不奇怪的。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本小冊子，出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此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他這本小冊子便是小資產者之曲解馬克思主義和口頭上虛偽地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完全背棄它的一個榜樣（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爲主要代表的現在的機會主義，完全站在以上馬克思所說明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爲這個機會主義承認階級鬥爭底範圍只以資產階級關係底範圍爲限（而在這個範圍以內，無論那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恰沒有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此鬥爭具有空前尖銳的形式的一個時期，所以這個時期底國家，必然應爲新的民主的（代表無產階級和一般貧民的）國家和新的專政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

再則，只有那些能够了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任何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分割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整個的歷史時代所必需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之實質。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非

常複雜，可是它們的本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歸根結底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自然不免有極豐富而極複雜的政治形式，可是它們的本質也必定只有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見『列寧選集』第十二卷，解放社版，第一一七至一二二頁。

——編者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

克思底分析

一 公社社員底企圖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的工人們，向他們證明推翻政府的企圖，是失望的發動。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最後的決戰已逼到工人們頭上來，使他們不得不出而應戰，而且暴動已成爲事實的時候，雖然當時有種種不利的朕兆，然而，馬克思却以極大的熱忱來慶祝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馬克思並不固守迂儒的非難，對於「不及時的」運動的非難，如臭名昭著的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哈諾夫一樣；普氏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他却大喊自由主義的呼聲：「本來不應動用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衝天」(馬克思底話)的「巴黎公社」社員們底英勇精神而大喜；而且他認爲這次羣衆的革命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是有偉大意義的歷史經驗，是世界無產階級革

命底相當的前進，是較之幾百條綱領和證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
得到策略底教訓，在這個經驗底基礎上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些便是馬克思自己所認定的任
務。

馬克思認爲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他已經根據『巴黎公社』的實底
革命經驗而實行做到了。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最後的一篇序言，由兩位著者簽名的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作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有些
地方現在已經陳舊了』。他們又說：

『……特別是『巴黎公社』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運用
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單括號中的詞句，是從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摘引出來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看得異常重要，而把它作爲對
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恰恰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共產黨宣
言』底讀者，即使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不明瞭這個修改底意思。我們以後要特闢

一章，對於這種曲解更詳細地加以討論。現在我們所要指出的，就是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底多言之流行的庸俗的「了解」，在於認爲：似乎馬克思在這裏着重遲緩發展底觀念，而與奪取政權對立起來，諸如此類等等。

實際上正是相反。馬克思底意思就在於：工人階級應當破壞並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僅限於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就是說，正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給庫格曼的一封信裏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認爲法國革命以後的企圖，是在於：並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機器從一手轉交他手，如今日以前一樣，而是要破壞它（馬克思底着重點；在原文上有 *zerbrechen* 一字），而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企圖，也恰恰就在這裏。」（見 *Neue Zeit*, 第二十卷第一期，第七〇九頁，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號）（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版，其中一版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破壞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器」這幾個字，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之主要的教訓，簡明地表白出來了。現在盛行一時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

「解釋」中所完全忘却了的，並且公開曲解了的，也正是這個教訓！

至於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裏所提及的話，我們已經在上面把牠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上述的馬克思底議論中，有兩點是特別要提出來講的。第一，他的結論只限於歐洲大陸。

這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自然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註一〇）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國主義，就太體講來，也沒有官僚制。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因為在當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沒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先決條件，也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是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那個除外已經不適用了。

世界上最大而最後的那二個無軍國主義和無官僚主義的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底代表者——英國和美國——已完全捲入全歐的污穢的血坑中去了，捲入駕馭一切和壓服一切的軍國官僚制度底血坑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和美國，『一切真正民衆革命底先決條件』，便是破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這些國家已經準備了像『歐洲』一樣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機器）。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和軍閥的國家機器是『一切真正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這個含有極深刻意義的指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民衆』革命這個概念，在馬克思的嘴裏說出來，似乎

有點奇怪，而俄國的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哈諾夫派和孟塞維克，——這些司徒魯威底信徒們，對於馬克思這樣的術語，也許認爲是一種「語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爲這樣簡陋的自由主義的曲解，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的，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了解是絕無生氣的。

如果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當然也要承認其爲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這兩個革命都不是「民衆的」革命，因爲在這兩次革命中，最大多數民衆都沒有積極而獨立地奮鬥，也沒有提出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要求。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獲得像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有時所得的那般「燦爛的」成績，可是毫無疑義的，它却是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因爲民衆，大多數民衆，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下層」民衆，都獨立地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破壞了的舊社會底廢址上按自己的利益而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尙未成爲民衆底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民衆捲入運動漩渦中的「民衆」革命，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有可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民衆」。這兩個階級由於受「官僚軍閥的國家機器」底壓迫，踐踏，剝削而聯合起來，搗毀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便是「民衆」的，民衆大多數的，工人和多數農

民之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底『先決條件』，要是沒有這個聯合，則民主制是不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雖然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可是它爲自己開闢了走向這個聯合的道路。

因此，在『真正的民衆革命』的時候，馬克思是絲毫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性的（關於這些特性，他常常而且很多說及的），同時他嚴密地估計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際對比關係。而在另一方面，他指出了，『破壞』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底利益所要求的，而這個共同的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消除『寄生蟲』而以某一個新的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的任務。

但是到底拿什麼來代替它呢？

二 用什麼來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呢？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只給了一個十分抽象的回答；正確地說，他只指出了任務，而不是解決這些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之組織成爲統治階級』，以『民主制之獲得』來代替它，這便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這一綱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應取什麼具體的形式，這個組織究竟如何與最先作和最徹底的『民主制之獲得』結合起來，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爲避免烏托邦計，卻期待從羣衆運動底經驗中，去找出一個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把『巴黎公社』底經驗（不管它怎樣少）加以十分精密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發端於中世紀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地存在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司法機關』，都發達起來了。隨着勞資間的階級衝突底發展，『國家政權日益帶有以壓迫勞動爲重務的社會收權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之機器底性質。表示階級鬭爭之相當進步的每一次革命之後，國家政權之純粹壓迫的性質，便日益公開的顯露出來了』。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底全國武器』。而第二帝國*鞏固了這一個武器。

『直接與帝國處於對抗地位的，便是「巴黎公社」』。『它是這樣的共和國之一定的形式』，『這種共和國，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之帝制的形式，並且要推翻階級統治的本身：』

。『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呢？『巴黎公社』曾經着手創

造的國家，又是如何呢？

「……「巴黎公社」底第一個法令，便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民衆。

這一個要求現在在一切自命爲社會主義政黨底黨綱中都有規定。但是它們的黨綱有什麼價值，這從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行動中表現得最明顯，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的革命之後，他們恰恰拒絕了實施這一個要求！

「……「巴黎公社」是依照普選制由巴黎各區所選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織的。他們是完全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更換的。他們的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被認爲是工人階級底代表：……」

「……向來是國家政府底工具的警察，立刻被革除了它的一切政治職務，而變爲公社底負責機關，隨時可以更換。……其他一切的行政機關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社員起，自上而下，一切爲社會服務的人員，只給以工人底工資。一切國家最高官吏之特權以及辦公費，現在都跟着這些官吏本身底消滅而同歸於盡……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既進行消滅之後，「公社」又即刻實行破壞精神上的壓迫底武器，即牧師底勢力

法蘭西的『第二帝國』，即拿破崙第三底帝國，存在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七一年。參看註釋（四）

和註釋（九）

——編者

。司法官也失去其似是而非的獨立性。

他們今後應該公開地選舉出來，要成爲負責

的。並且隨時可以更換的：……」。

如此，「巴黎公社」用以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善的民主制；取消常備軍，一切官吏之完全選舉和罷免。但是事實上這「僅僅」是表示以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機關來代替舊機關的一種偉大的改變。這裏恰恰可以看到「由數量變到質量」底情形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實現的那樣最完美最澈底的時候，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由國家（等於壓迫某一階級的特殊力量）變爲已非原來的國家的一種東西。

壓倒資產階級及其反抗，這還是必要的。而對於「巴黎公社」，這尤其是必要的：「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十分堅決的來做這件事。但是在這裏，壓迫機關就是大多數的民衆，而不像向來奴隸制、農奴制和僱傭奴隸制之下的情形那樣，造成壓迫的機關的是民衆的少數。可是一經到了大多數民衆自己去壓倒他們的壓迫者的時候，壓迫底「特殊力量」已經沒有必要了！在這種意義上，國家便開始衰亡。大多數的民衆能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特權的官吏、常備軍底將領）底特殊機關，自己直接執行一切職務；國家政權職務日益由全體民衆來執行，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性便將日益減少。

在這種關係上，馬克思所着重說明的「公社」底辦法，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取消支給官

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服務人員底薪俸，減低到和「工人底工資」相等。在這裏於於最明顯地表現出一個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變為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壓倒某一個階級的「特殊力量」的國家，變為用大多數民衆——工人和農民——底全體的力量，來壓倒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之被人忘却了的，也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在通俗的書籍中（這樣的書籍，不可勝數）都沒有提及這一點。對於這一點，「通例」是不講的，正像人們對過去「幼年時代的浪漫」不講是一樣，像基督教徒達到了國教的地位的時候，便「忘記了」原始基督教之「純正」及其革命的民主精神是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是「一種」簡單的「幼稚原始的民主主義之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造者』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派——培恩斯坦會屢次重複卑鄙的資產階級的嘲笑口吻，來嘲笑『原始的』民主主義——（註一一）。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第一，他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非有相當地『回復』到『原始的』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不然，試問何以能進到使國家各種職權由大多數民衆和全體人民來執行呢？）；第二，他完全不懂得，建築在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之基礎上的『原始民主主義』，與太古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並不是一樣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文化創

造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報等等，而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收權」之大部分的職務，已大大地簡單化了，這些職務可以和登記、填表、檢驗之最簡單的手續一樣辦理了，這些職務，每個識字的人都能够勝任，執行這些職務，只要付以「工人底工資」，也就可以了，在這些職務中之一切什麼特權的，「指揮的」黑幕，也就可以（而且應該）取消了。

一切官吏之完全選舉和隨時可以更換，降低他們的薪俸到普通「工人底工資」一樣的程度，——這些是簡單的而且「不言而喻的」民主的辦法，這些與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利益完全相適合的，同時也就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條橋樑。這些辦法都是關於社會之國家的、純粹政治的改造，不過這些辦法，只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準備實行的「掠奪掠奪者」的步驟聯系起來，就是說，只有與生產資料之資本主義私有權轉變為社會的所有權的過渡聯系起來，才能有其全部的意義。

馬克思說過：

「巴黎公社」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革除了國家的兩大支出——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底其他各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僅只有很少數的人「高昇」、「做人」（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就是說，或者變成富人、資產者，或者昇為有保證的、享特權的官

裏，凡有農民存在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農民存在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着政府的壓迫，他們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的」政府。而能夠實現這個任務的，只有無產階級，且無產階級在實現這個任務時，同時就對國家實行走向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步。

三 代議制底消滅

馬克思說：

「巴黎公社」不是國會的，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

「……從前每三年或六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去代表和鎮壓（*von Vertreten*）民衆，現在不然，普選權對於組織在「公社」的民衆之作用是在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管賬員，這正像個人的選舉權爲單獨的企業主用以達到同一目的，是一樣的情形。」

馬克思對於代議制這一種特出的批評（在一八七一年寫的），由於現在社會國家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被人「忘却」了。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爲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們和「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一切對代議制的批評，都讓之於無政府主義者，並且根據這個極巧妙的理由

宣佈一切對於代議制的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在「先進」的代議制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微特、李謙、山巴、倫諾德、亨德遜、萬德威爾、斯道寧、柏蘭廷、皮沙拉底等一類的「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所以逐漸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雖然它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這是絲毫不足爲奇的。

但是，革命的辯證法對於馬克思決不是像普列哈諾夫、考茨基等所慣用的那種空洞的時髦話與響亮的高言一樣的。馬克思善於無情地與無政府主義決裂，因爲無政府主義特別在革命形勢顯然沒有時候，不會利用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底「豬欄」；可是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代議制加以一種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來摧殘和壓迫民衆——這便是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之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立憲的君主國裏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也這樣。

一 但是，如果我們提到國家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把代議制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從無產階級在這一方面的任務底觀點上來說，那末，跳出代議制的出路在那裏呢？怎樣能够不要代議制呢？

我們要再三反復地聲明：馬克思基於研究「巴黎公社」所得的教訓，完全被人們忘却了，故現代的「社會民主派」（應該讀作：現代社會主義底叛徒）除了無政府主義或反動派對代議制的批評而外，便完全不知道任何別的批評了。

跳出代議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在於把「清談館」式的代表機關，變為實際「工作的」團體。

「『公社』不是國會的，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

「不是議會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是直接對準着現代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和國會「守房門的小狗們」說的！請看任何一個議會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真正的國家大事是在後台辦理，而且由各行政部、事務處、參謀部執行的。而在國會裏，僅僅藉空談來達到愚弄「平民」的特殊目的而已。

這種事實是正確到這樣的程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裏，——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堵還未來得及建立真的國會以前，而代議制底一切這些罪惡都已經馬上明白表示出了。腐敗的小資產階級底英雄們如斯可比列夫、蔡雷特利、威爾諾夫和奧克仙蒂使之流，甚至於收來把蘇維埃變成爲一種最腐敗的資產階級代議機關，使蘇維埃成爲清談館。「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面用種種空言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夫們。在政府裏面，有不斷的更換，一方面爲的要盡可能的依次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來享受這個「肉饅頭」，來多佔一些高貴的位置，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大事，却都在事務處和參謀部中「辦理」了！

掌握政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民事」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部的社論中（以「大家」都以政法資深爲業的「好社會」中的人們之公開直爽性）曾經承認，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內閣各部中，所有官吏的機關實際上仍然是舊的機關，它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來阻撓革命的企圖！其實，即使沒有他們這一種承認，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就不能證明這些事實了麼？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這一點：在內閣界中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坐的威爾諾夫、路桑諾夫、孫齊諾夫以及「民事」報編輯部的諸位先生們把廉恥都完全喪盡了，所以他們就毫不客氣地來宣佈說（如談論閒事一樣），在「他們的」內閣各部中，萬事一皆如舊！用革命民主一類的話來欺騙一般鄉里愚民，用官僚事務室的攔擱延宕來爲資本家謀「福利」——請看這就是「廉潔的」聯合政府底本質。

「巴黎公社」採用了新的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底賣身的腐敗的代議制，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判斷和討論底自由，就不是一種騙人的勾當；因爲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察實際生活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此地還存在着，可是作爲一種特殊系統，作爲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作爲議員們之特權位置的這種代議制，已經沒有了。沒有代表機關，則民主制便無從設想，甚至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不單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底

統治的志向，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向，而不是爲籠絡工人們底投票的『選舉的』空談，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謝德曼、李謹、山巴和萬德威爾等輩所做的那種行爲一樣，那末，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要代議制。

馬克思講到『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那種官吏底職責時，他拿這些官吏來與『其他一切僱主』所用的職員相比，就是說，與應用『工人、監工和簿記』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底職員相比，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馬克思絕對沒有一點烏托邦思想的痕跡，就是說他沒有虛構或幻想一個『新的社會』。他不是這樣的。他把從舊社會產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爲一個自然界和歷史的過程來研究。他利用無產階級羣衆進行的實際經驗，而努力設法去從這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他從『巴黎公社』中去『學習』，正同所有過去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們毫不恐懼地去學習許多被壓迫階級偉大的革命運動底經驗一樣的；他在來不向他們講過一句迂儒『道義之言』（如像普列哈諾夫說：『本來不該應用武器』，或如蔡富特利說：『一個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把官吏制度到處立刻廢除，這是不行的。這是一種烏托邦。但是舉而把舊的官吏機關打破，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組織，使國家能夠消滅一切官吏制度——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這是『巴黎公社』底經驗，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直接的當前的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行政任務簡單化了，它給我們能夠推翻「指揮制」而把一切事務歸納爲無產者底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用全社會名義來僱傭「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絕不「夢想」如何把一切的行政機關和一切的從屬關係立刻廢除；這些都是由於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缺乏了解而發生的一種無政府主義底夢，這些夢想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只是把社會主義革命延擱下去，一直延擱到人們變到另外一種人時爲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要用現在的人們來從事於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要是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員」，便什麼事都不能進行。

但是，對於一切被剝削者和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是必須服從的。國家官吏之特別的「指揮制」是可以並且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刻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務來代替它，這些職務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底能力所能勝任的，並且給予「工人底工資」，也就可完滿地執行了。

我們從資本主義已經建設起來的一切條件出發，去組織大規模的生產，我們工人自己依靠自己的經驗，建設起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它；即此我們把國家官吏底職務歸納到只是執行我們的訓令的作用，他們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更換的，而且是報酬微薄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各種各樣的技術專家），——這是我們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

革命完成之後，可以而且必須從此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的這個開始，將自然而地使所有的官吏制度漸趨於「泯滅」，使一個新的制度逐漸地創造出來，這是一個沒有括弧的制度，不似僱傭奴隸制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監督和報告之不斷簡單化的職務，將由大家輪流去執行，然後將成爲習慣，最後將不成爲人們底特殊階層底特殊職務。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稱郵局爲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的郵局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底方式組織起來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正在逐漸地把所有的托拉斯變爲同一形式的組織。在那些工作過重而還挨着饑荒的「普通」工人們之上，這裏存在着同樣的資產階級的官僚制。但是社會的管理底機械，這裏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只須去打倒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手去壓服這些剝削者底反抗，去打破現代國家的官僚機關；——我們就有一個沒有「寄生蟲」而是高度技術設施的機械，這個機械可以由團結着的工人們親自來運用，同時僱用技師、監工、會計員，而以工人底工資相等的薪水付給他們一切人，如付給「國家」一切官吏們一樣。這是關於所有托拉斯的一個具體的、實際的，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能够解除對工人們的剝削，能够把「巴黎公社」實際上已經開始的經驗（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實際地應用出來。

依照郵局的制度去組織我們的全部國民經濟，而要使所有的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一切官

吏都不能得到超過「工人底工資」的薪金，並且要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監督和領導之下，——這便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經濟基礎，才是我們所必需的。這樣才能破壞代議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避免資產階級之強姦這些機關。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在「巴黎公社」沒有時間去往後發揮的那個全國組織底短論上，十分明顯地說：「公社」應該成爲甚至一個極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的「國民代表機關」應由各地的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候中央政府所保留着的爲數不多而意義很重要的幾種職務，是不應該廢除的（如說應該的話，那是有意的欺騙），而應該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就是說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是不應該破壞的，反之，它應該藉公社制度的方法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實際，其方法就是，消滅那自認爲是這個統一的體現者，但同時却欲離民族而獨立，且立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其實只是民族身體上的寄生贅疣而已……。」

「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府權力底純粹壓迫機關，而其有用的職權，要從企圖站在社會

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負責的公僕們。」

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這些話不了解——或者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了解——到怎麼一種程度，這在培恩斯坦所著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註一一）一書中表現得最明白了。正是關於上面所引的一段馬克思的話，培恩斯坦這樣寫着：『這個政綱』就其政治的內容說，在所有的重要點上，十分類似蒲魯東的聯邦主義。（註一二）

不管『小資產者』蒲魯東（培恩斯坦把『小資產者』數字放在引號之內，在他的意思謂蒲氏爲小資產者是不相稱的）和馬克思的不同之點有多少，可是在這淺點上，他們兩人的思想行程，是幾乎完全相同的。培恩斯坦接着又說，自然，市自治底重要現在正在增長着，但是

『我覺得很懷疑，是否照馬克思和蒲魯東所想的那樣：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是取消（*Abolition*）原意爲：解散，融解）現代的國家，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現代國家的各種組織，就是說，由各州和各特別區的議會代表組織國民會議，而省和區的議會，本身則又由公社的代表組成，——這樣便把全國代表機關底舊方式完全消滅了……』（培恩斯坦：『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一三四和一二六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蟲』這一個見解來和蒲魯東底聯邦主義混爲一談，這真是無奇不有！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機會主義者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裏並

不是說以聯邦主義來反對集中制，而是說要做壞存在於所有資本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本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不外是『市自治』，這是他們在自己周圍，在小資產階級的庸人社會中和『改良主義的』沈滯環境中所能看得到的東西！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簡直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然而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關於培恩斯坦所說的這一點，從來沒有人起來爭論過。很多駁培恩斯坦的人，——特別是在俄國文壇中的普列哈諾夫和西歐文壇中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從來沒有說過關於培恩斯坦這一個對於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的不會用革命頭腦去思索和不會對革命着想，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於把『聯邦主義』的大帽子戴到馬克思的頭上，並且把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爲一談。而自願做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哈諾夫，對於這一點却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的最庸俗的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加以討論。

在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論『巴黎公社』經驗的一段文字裏，並沒有一點聯邦主義的痕跡。馬克思真正同意於蒲魯東的地方，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完全沒有看見；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的不

同之點培恩斯坦却認爲相同之點。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都主張『破壞』現時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蒲魯東和巴枯寧都在內）這一種相同的見地，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都不願意知道，這就是因爲在這一點上，他們都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與巴枯寧的不同點，恰恰就在聯邦主義上面（至於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用說了），聯邦主義原則上是由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所產生出來的。而馬克思是一個集中主義者。在上邊所摘引的一段議論中，他絲毫沒有離開集中主義。只有那些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對國家的『迷信』的人們，才能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消滅，誤認爲集中主義底消滅！

但是，假使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的政權握在他們自己手裏，把他們自己完全自由地組織在公社之內，將所有公社的行動聯結一致，藉此向資本進攻，壓服資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的私有財產交給全體國民，全體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主義麼？這不是最澈底的民主集中主義麼？這不是無產階級的集中主義麼？

培恩斯坦連想都不能想到有自願的集中主義之可能，有由許多公社自願結合而爲一民族之可能，和有由無產階級的公社自願的聯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之可能。培恩斯坦同一般的庸人一樣，他所能夠想像的，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集中主義，只有官

僚主義和軍閥主義才能強迫實行和維持的一種集中主義。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自己的見解有被曲解的可能，而故意着重地說，凡是非難「公社」要破壞民族統一和取消中央政權，這便是一種有意的欺騙。他故意用「組織民族統一」一句話，要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主義，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僚的集中主義相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的人，比一切驢子要壞些。現在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恰恰不願意聽國家政權底消滅，寄生蟲底消滅。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的話了。現在我們再引他的話來補充一下。

馬克思說：

「……歷史上新的創設之普通所遭遇的命運，常是這樣：它每每被人指為抄襲舊的社會生活形式，又因那些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舊時的社會形式相類似，因此它就甚至被人視為陳腐的社會生活形式。因此這個破壞（Break——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的「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的公社底復活（註一三）……，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一個聯邦（孟德斯鳩，基耶特）……看作是古代用以反對過份的集中主義的鬪爭之放大的形式……。」

「公社的結構要把被寄食於社會而妨害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併吞了的一切力量，都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就己能將法國底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的結構要使鄉村的生產者，受每一州區底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且從城市工人中間獲得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然的代表。公社本身底存在當然包含着地方自治；但是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成爲多餘物品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國家政權」，（它是「寄生的贅瘤」），「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在成爲多餘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時關於國家問題所用的詞句。

所有這些，是馬克思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現在應該把它們開掘出來應用，使廣大的羣衆能够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從他所經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所獲得的結論，恰恰在現在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期已經正在到來的時候，被人們忘却了！

「……對於「巴黎公社」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顯的利益底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十二分伸曲自如的政治形式，可是一切舊時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形式。「公社」之真正機密之處是在：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階級反對佔有階級的爭鬥底結果，最後它是完成勞動階級經濟解放的公開的政治形式……。」

「要是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的結構便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烏托邦主義者，從事於各種政治形式之「發明」，使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造得在這些政治形式之下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於任何政治形式的問題，都置之不理。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為代議制的民主國家底資產階級的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界限，他們在這個「標本」之前祈禱，碰破了頭額，並且把每一個破壞這種政治形式的企圖，都稱為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鬭爭之全部歷史中得一結論說，國家是必然要消滅的，而國家消滅之過渡時期（從有國家到沒有國家的過渡時期）底政治形式，就是「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不去發明這個未來的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地考察法國歷史，分析它，以及他在二一八五一年所得出的結論：情形正在發展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運動爆發了的時候，雖然這個運動是失敗的，短期的，而且顯然是孱弱的，而馬克思却開始去研究，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勞動底經濟解放是可以實現的。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第一次企圖，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是可以而且必須來代替已破壞的國家機器的。

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之中和各異的條件之下，繼續着『巴黎公社』底事業，並且證實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的正確。

第四章 恩格斯底補充說明（續上）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曾給我們一個基本的觀念。恩格斯會屢次提及這個問題，並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問題底另一方面發揮得更有力而明瞭，故我們不得不對於這些解釋，特別加以研究。

一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就已經估計到「公社」底經驗，他再三申說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在這個具體的問題上，很明白地表示出：一方面，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代國家，有許多類似之點，這些類似之點就使我們有所根據把這兩種都稱為國家；他方面，無產階級的國家又有一些不同之點，或者可以說它是消滅國家的一個過渡。

「怎樣去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是完全與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的：要藉需求和供給之逐漸的經濟上的均等方法來解決的；可是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自身不斷地在那裏產生新的問題；就是說它並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不僅是要看時間和空間的情形而定，而且它還與那些更深遠的問題相聯系的，而這些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對抗性。我們既不願從事杜撰將來的社會結構底烏托邦制度，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在的大城市中住宅是很充足的，立即可以幫助實際上需要住宅的人，只要住宅應用得合理。但是很明顯的，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將他們的房子讓那些沒有房子住的工人或現在住客過多的屋子裏的工人們搬進去住。無產階級一旦得了政權，這種以社會利益爲基礎的辦法，立即就像現代國家之實行一切剝奪和佔據房屋一樣容易執行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沒有提到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是講它的活動底內容。現在剝奪和佔領房子，也依現代國家底命令來實行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上看來，也要「命令」佔領住宅和剝奪房屋。但是很明顯的，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相勾結的官僚機關，對於施行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簡直是不中用的。

「……在這裏必須指出，勞動民衆之真正奪取一切勞動工具及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派的「贖買」法完全相反的。在後一種辦法之下，單個工人變爲領有住宅、領有農民一片土地

以及勞動工具的私有者，但在前一種辦法之下，却是「勞動民衆」變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底集體的所有者了。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在過渡時期，是難以給個人或私人團體而不徵收租金的。同樣的，取消土地私有權不一定要取消地租，不過用不同的形式將地租轉交給社會罷了。所以勞動民衆之實際上佔有一切勞動工具，並不使僱傭和租讓底保存因此而廢除。」（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這裏所提及的問題，就是關於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恩格斯說得很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至少在過渡時期」是「難以」分配房屋而不收租金的。把屬於全國國民的房屋租給各個家庭而課以一定的租金，則就需要徵收租金，須有某種監督，須有房屋分配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要有某種國家形式，可是這並不要特殊的軍事和官僚機關以及官吏特有的特權地位。至於過渡到可以免費出讓房屋的地步，這是與國家完全「衰亡」有連帶關係的。

恩格斯在講到白郎基主義者在「公社」後和在它的經驗影響之下而站到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立場上來的時候，會順便把這個立場描寫成爲下列的一句話：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是因爲這是達到取消階級和同時即取消國家底一種過渡。……」（五五頁）

那班愛好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是那班「殘殺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也許以爲在承

認「取消國家」和否認上面所引「駁杜林」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公式之間，是有矛盾的。假使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現在社會國家主義者之誣國際主義者爲無政府主義，正在日益普遍起來。

國家隨着階級的取消而取消，——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告訴我們的。從「駁杜林」一書中關於「國家衰亡」的最著名的一段，其所斥責無政府主義者的不是簡單地責斥他們主張取消國家，而是斥責他們宣傳似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取消國家。

因爲今日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完全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這個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關係，所以我們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發生於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彙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自主派」或「反威權派」。這些論文的德文譯稿到一九一三年才在“*Zeitschrift*”發表。

馬克思譏諷無政府主義者之否認政治行動，他說：

* 『新時代』，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

——校者

「……假使工人階級底政治鬭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假使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的專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末他們就犯了一種污辱原則的可怕的罪惡了，因為他們爲要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爲要撲滅資產階級底反抗起見，他們不放棄武器，亦不取消國家，而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過渡的形式……。」（*Neue Zeit.*）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一卷第四〇頁）

這樣的「取消」國家是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所竭力反對的！馬克思並不反對階級消滅國家也隨之而消滅的理論，或是階級取消國家也隨之而取消的理論，而只是反對那主張工人們要放棄使用武裝，放棄有組織的暴力，即是說放棄國家，因工人們要用國家來撲滅資產階級之反抗。

馬克思故意着重地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之「革命的過渡的形式」，以免人們把他與無政府主義鬭爭底真正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意見不同的地方，並不是在以取消國家爲目的一問題上。我們肯定地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暫時使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同樣爲要消滅階級，也必須暫時建立被壓迫階級底專政。馬克思選擇了一種最有利最明顯的問題底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推翻資本家底羈絆的工人們，是應該「放棄武器」，還是應該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撲滅他們的反抗呢？假使一

個階級有系統地來使用武器去反對另一個階級，那不是國家底「過渡形式」是什麼？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問自己：在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是不是這樣提出國家的問題？「第二國際」下的最多數的正式社會黨，是不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發揮得更加詳盡而更加通俗。他首先深刻地指出蒲魯東主義者錯亂底思想，這般蒲魯東主義者自稱是「反威權主義者」，就是說反對一切威權，一切從屬以及一切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海船來說吧，這些以運用機器和許多人有計劃合作為基礎的種種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從屬，沒有某種威權和權力，那末他們中任何一種都沒有動作的可能，這難道不明顯麼？

恩格斯說：

「假使我用這些論據來反對那最拚命的反威權主義者，那時他們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啊！這是對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所賦予我們的代表的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爲變更了名詞，就可以改變某種事物了……。」

這樣恩格斯證明了：威權和自主都是相對的概念，它們的運用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之不同的階段而變更的，而最荒謬的是把它們看作絕對體；恩格斯又補充地說，機器應用和大規模生產底範圍，是不斷地在擴大起來；他在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談論之後，接着便講到國家的問題。

恩格斯寫道：

「假使自主派僅僅說，將來的社會組織只能在生產條件所劃定的範圍之內允許威權存在的話，那末我們或者就可以和他們把問題弄清楚了；但是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或爲必要的事實都閉着眼兒不看，却一味拚命地在字眼上爭論不休。

「爲什麼那般反威權主義者不單單是爲反對政治的威權和反對國家而呼號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一致承認，國家和與國家相隨而發生的政治威權，都要隨着將來社會革命的結果而消滅的，就是說，社會職務失去其政治的性質，而變爲一種注意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務了。但是，反威權主義者主張把政治的國家於一併那間消滅下去，甚至主張在產生國家的社會關係尙未消滅之前，把它消滅下去。他們認定社會革命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消滅威權。

「這些先生們曾經見過了一次革命沒有？毫無疑義的，革命是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人民用刀槍大砲，即用有非常威權的工具去強迫別一部分人民來履行他們自己的意志的一種行動。而勝利的政黨，必然不得不用武裝威嚇反動派的那種恐怖手段，以維持其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靠着人民武裝的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它能夠維持到一日以上的時間嗎？反轉來說，我們因爲「巴黎公社」太少使用這種威權而責備它，不是對嗎？由此可知，反威權主義者，或是不知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在這個場合中，他們僅僅自己投入了迷

網；或是他們是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在這個場合中，他們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底事業。二者必居其一。無論怎樣，他們都是幫助反動派的。」（第三九頁）

在這一段言論中間，已經講到了許多將在下一章中我們講國家衰亡時之政治與經濟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所要加以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關於社會職務之由政治的而變為單純的管理職務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一名詞，是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它指出國家衰亡底過程：正在凋殘中的國家，在它衰亡底某個階段上，可以名之為非政治的國家。

在恩格斯這一段言論中之最顯著的一點，也就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底提法。願做恩格斯底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三年以來，與無政府派爭論已不下幾百萬次，但是他們並沒有做過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能够並且必須做的爭論。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取消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所提的問題就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不願意看到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暴力、威權、政權、國家等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尋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小資產階級庸俗口頭禪：「我們是承認國家的，而無政府主義者則否！」這樣的一種口頭禪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會使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退避的。恩格斯的意見就完全不是這樣：他着重地說，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滅，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隨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正是機會主義的社

會民主黨人所往往避去，而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解決」的問題。恩格斯很果斷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公社」是不是應該更多地使用國家底革命政權，就是說，使用武裝的、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政權呢？

現在佔優勢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具體的任務問題，平常不是僅僅用庸人底冗談來敷衍，便是只好用下面的一個遁辭來搪塞，說：「我們將來可以看到」。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種社會民主黨，說它背叛了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利用最近這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爲了要極具體地去研究：無產階級對於銀行與國家，應採取何種行動以及怎樣去採取這種行動。

三 給培培爾的信

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恩格斯給培培爾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話，是要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最出色的議論之一（如果不是最出色的議論的話）。我們要附帶地說明，就我們所知，這封信第一次是由培培爾刊印於他的言行錄（『我的生活』）第二冊中的，這部言行錄，刊行於一九一一年，就是說，是在這封信寫就及郵寄之後的第三十六年。

恩格斯在那封給培培爾的信中，批評了馬克思在致白拉克（註一四）的有名的信中所亦會批

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而且他把國家問題特別提出來講，他這樣說：

「……自由人民國家變爲自由國家了。從這個字的文法的意義上講，自由國家，就是對於自己的公民是自由的一個國家，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其實我們最好把這一句關於國家的空談丟開不提，尤其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因爲從國家這個名詞的原來的字義上講。「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每每拿「人民的國家」的說法來攻擊我們，使我們討厭極了，雖然馬克思反蒲魯東的著述中以及「共產黨宣言」中早已十分明顯地說過，國家是要隨着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開創而自行解體（*sich auflöst*）和消滅的。因爲國家不過是一種過渡的機關，在鬭爭中和革命中應當利用這個機關，以使用強力來壓服自己的敵人，所以說什麼「自主人民國家」，完全是無意識之談，在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並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要壓倒它的敵人；到了真正能夠說到自由的時候，那時國家之爲國家已經是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們可以提議無論在何處都用「公社」（*Genossenschaft*，這個好的德國古字來替代國家，這一個名詞，這個德國古字的意思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是相同的。」（見德文原稿第三三二頁）

我們應該記着，這封信是關於黨綱的，而這個黨綱是被馬克思在他的一封信中所批評過的，這信僅在恩格斯那封信的幾個星期（馬克思的信是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寫的）（註一四）以後，當

時恩格斯與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當他說「我們」，那時無疑的是恩格斯拿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黨的首領提議將黨綱上的「國家」字樣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字樣。

如果向那些爲機會主義者之方便而偽造馬克思主義的首領們提議在黨綱上做這樣的修改，那末他們將怎樣狂吠而叫喊着「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還要褒獎他們呢。

可是，我們還是要做我們的事。我們在審查我們的黨綱的時候，對於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忠告，是絕對應該注意到的，這樣我們才能接近真理，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洗清一切對於它的曲解，以便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向着更正確的路線進行。在布爾塞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一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的。困難或許只是在名詞上。在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社」，而恩格斯所採用的一個，並不是表示一個單獨的公社，而是表示全體公社之總和的一種公社底制度。在俄斯文中沒有這一個字，然而我們或者可以採用一個法文字「Commune」，雖則這個字也有它的不適當處。

「從字眼的原意上講，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論上的斷言。看了上面的解說之後，對於這種斷言就可以完全了解了。當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人民，而只是少數人民（剝削者）的時候，公社就已經不成爲國家了；這時它已經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而全體人民已經自己登臺以代替一種特殊的壓迫勢力了。凡此一切，都已經離開了國家庭原意。要是「巴黎公社」已經鞏固了的話，那末國家庭痕跡，就將在這種情形之下自行「泯滅」，公社也就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了，因國家機關將隨着無事可做而停止自己職務。

「無政府主義者拿「人民國家」的話來攻擊我們」，恩格斯講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的對的地方，只是在於：因為「人民國家」與「自由人民國家」是一樣的荒謬，一樣的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努力要改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鬭爭，使這種鬭爭真正合乎原則，並且把其中所有的機會主義者對國家的偏見掃除淨盡。可惜呀！恩格斯這封信在書櫃中隱藏了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就是這封信發表之後，考茨基依然很頑固地繼續重複恩格斯曾經所警告過的那些錯誤。

培培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覆信給恩格斯，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關於黨綱草案的批評，並說他指斥了李卜克內西的那種讓步態度（培培爾底言行錄，第一卷，德文版三〇四頁）。但是，拿培培爾底「我們的目的」那本小冊子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中對於國家問題有許多絕對錯誤的議論：

「應該把建築在階級統治基礎上的國家變為人民的國家。」（"Unsere Ziele", 德文版，第一四頁，一八八六年出版）

這是刊印在培培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這樣堅決繼續着機會主義者關於國家的議論，是不足爲奇的，尤其是當恩格斯底革命的理解被藏匿了，而一切生活環境又長久使人們『忘記了』革命的時候。

四 『愛福特綱領』草案底批評

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對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恩格斯寫給考茨基的那個『愛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這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過了十年之久才在『Neue Zeit』上發表的），是不可忽略的，因爲這個批評主要的就是對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念而發的批評。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又有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一個指示表現着恩格斯何等用心，何等深思地研究最近資本主義之種種變態，因此他又多麼能够在某種程度以內預言我們所處的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是關於綱領草案中所用的『沒有計劃』（Planlosigkeit）等字樣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質的，恩格斯說：

『……假使我們從股份公司觀察到統治並壟斷許多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時，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裏不但私人的生產停止了，而且沒有計劃的現象也消滅了。』（見『Neue Zeit』）

這裏已經有了對最近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理論上的估計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資本主義已變爲壟斷的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這幾個字我們必須加上着重點，因爲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觀點，他們以爲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或其他同類的東西了。完全計劃化，當然托拉斯是從來不曾有過，現在也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的。但是資本大王既然預先計算國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底大小，既然他們有計劃地來調節生產，那末托拉斯是有計劃的，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之下，可是毫無疑義，究竟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真正的代表看來，應該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接近，容易，可以實現和迫切底證據，而並不是像一般改良主義者所做的一樣，用這種接近來作爲容忍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容忍讚美資本主義的論據。

這是我們要回轉來講國家問題。此地恩格斯曾經給了三個非常有價值的指示：第一，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關於民族問題與國家結構之間的關係；第三，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講到共和國的問題，那是恩格斯拿來做他的『愛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底重心的。要是我們記得當時『愛福特綱領』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有怎樣的作用以及它怎樣成爲整個『第二國際』

底模範，那末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批評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恩格斯說：

『草案底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應該說到的東西，其中都沒有說到』（恩格斯底着重點）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的憲法僅僅是一八五〇年那部最反動憲法底抄本，德國國會（Reichstag），正像李卜克內西所說的，不過是『專制政體底假面具』，而以固定日耳曼各小國的存在及日耳曼各小國聯邦州憲法爲基礎，想來實行把『所以勞動工具變爲公共財產』，這是一種顯然的荒謬』。

恩格斯接着說，『提及這個問題是危險的』因爲他深知在德國要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載在綱領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恩格斯還不以這種使『每人』都滿意的明顯的理由爲已足。他又接着說：

『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該進行的。這事的必要到了怎樣的程度，已經被現在大部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所廣佈的（*circulaire*）機會主義表明出來了。有些人恐怕那些反社會主義者的法令（註一五）底復活，或是回想起當這個法令施行期間所發表的那些不及時的宣言，於是就希望我黨承認德國現行的法制是足以和平地實現它的一切要求的。』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害怕非常法令（註一五）之復活這個主要的事實提在第一位，而且毫不冒昧地名之爲機會主義。他中言說，正因德國缺乏共和國與自由，所以「和平」道路的幻想簡直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十分小心地使自已不致掣肘。他承認在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和平的發展到社會主義，但是對於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的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認爲有這種可能（沒有這種承認的任何的必要）這無異於從專制政體那裏摘去了它的無花果葉，而自己又去掩蓋它的裸體……。」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極大多數的正式首領們，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真正成了他們專制政體底掩護者。

「……這樣的政策，其結局只是把黨引到不正確的道路上去。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置諸前列，而把那最緊急的具體問題遮蔽起來，這些具體問題在一旦發生大的事變和政治危機的時候，將自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去的。這樣一來，它的必然的結果，就是：在緊急關頭，黨突然束手無策，關於緊急問題，黨內便莫名其妙和沒有一致，因爲這些問題從來預先沒有討論過……。」

「這種爲着目前一時的利益而忘却了重大根本的問題，這種貪圖一時的成敗，這種不預

計未來的結果，而只顧着爲這種成功的爭鬪，這種爲着現在而犧牲將來的運動，或者統統都是因爲「誠實」的動機緣故。但這是機會主義，而且現在依然還是機會主義，而「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要危險……

「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的，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這一點法國大革命已經表現出來了……」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反復說明一個基本觀念，這個觀念貫徹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最近便的途徑。因爲，這樣的共和國不但絲毫消滅資本底統治，以及對民衆的壓迫和階級爭鬪，而且必然會使這個鬪爭更發展，更擴大，更公開，更尖銳，而被壓迫羣衆的根本利益得以滿足的可能性一旦發生，則這種可能性，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以及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些羣衆以下，才必然實現出來。對於整個的「第二國際」，這也成爲馬克思主義中的「被遺忘了的話」，而這種遺忘，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頭半年中，孟塞維克黨底歷史是表現得異常明顯的。

關於民衆底民族成分和聯邦共和國問題，恩格斯這樣說：

「應該用什麼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呢？」（他有反動的君主憲法，還有同樣反動的許多

小國底分立，這個分立是足以鞏固和助長「普魯士主義」而不能使它們在德意志中鑄合而爲一國。」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利用一種整個而不分立的共和國的形式。在今日美國廣大的境域上，整個的說來，聯邦共和國還是必需的；可是雖然這樣，它在東部的省分內已經成爲一種障礙了。在英國，聯邦共和國要成爲一種進步的現象，因爲在英國的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種民族，而它的國會雖只有一個，可是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存在着。在小小的瑞士，聯邦共和國已經很久很久就成爲一個障礙物了；而它之所以尙能容於瑞士，只是因爲瑞士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之純粹消極的一分子之故。如果在德國而實施瑞士式的那種聯邦制度，那就要成爲一個很大的退步。聯盟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二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入聯盟的單獨的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的特殊立法，有它自己的特殊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並肩而存的由各個國家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個國家不管其大小，都可以投票的。在德國，聯盟的國家是達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一個過渡，我們不要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由上而下的革命」（註一六）往後倒退，我們應該用「由下而上的」運動來補充它。」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而且還非常細心而盡力地恰恰去分析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種情形之歷史的具體特點來確定，某種過渡形式是由什麼過到什麼的一種過

渡。

恩格斯和馬克斯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堅持民主集中主義，堅持統一而不分離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共和國，若非發達上的一個例外和障礙，便是由君主國過到集中的共和國的一個過渡，它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是一個『進步』。而這些條件之一，就是民族問題。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的批評了小國家底反動性和在一定的具體場合中利用民族問題來掩蔽這種反動性的那種行動，可是他無論何處都沒有絲毫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這種傾向，是荷蘭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極正當的反對『自己的』小國家底小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爭鬥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它有地理條件，它有統一的語言，以及數世紀以來的歷史，似乎已經把它所包含的各個單獨小區域底民族問題『解決了』，——即在這裏，恩格斯估計到明顯的事實，認定民族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也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絕對沒有拒絕對於聯邦共和國之缺點的批評，也沒有拒絕為實現統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作的最堅決的宣傳和鬭爭。

但是恩格斯對於民主集中主義的了解，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無政府

主義者也在內）應用這個概念一樣，把它看成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意思。恩格斯認為集中主義絕不是要把廣大的地方自治除外；在各個區域和「公社」自動地堅持國家底統一的情形之下，這種地方自治能無條件的把一切官僚主義和一切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消除。

當恩格斯發揮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政綱觀點時，他這樣說：

「……這樣說來，是統一的共和國，但這不是指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而言；法蘭西共和國並非別的，只是一七九八年所建立的一個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註四）。從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每一個省分 and 每一個鄉里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也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應該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可以沒有官僚制而行事，關於這些，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已經指示和證明給我們看了，現在加拿大、澳洲和其他英國的殖民地也指示給我們看。這樣的省分的（特別區的）和鄉里的自治，是要比瑞士的聯邦制自由得多，雖然，在瑞士的聯邦制之下，單個小國對於他們的聯邦國家是獨立的，但是，它對於縣和鄉里的關係也是獨立的。單個小國的政府任命縣的地方督軍和地方長官，這是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一種現象，而在我們的國家中，這種現象將來必定要完全廢除，同時要廢除普魯士的『Landrat and Regierungsrat』（就是由上任命的那般特任官、督軍、省長等等）。根據這點，恩格斯關於黨綱中自治問題的一條，提議這樣寫法：『各省各縣各鄉完全自治，經過依

普選法所選出的官吏來管理，完全取國家所任命的一切地方和各省的政權。」

在克倫斯基和其他「社會主義的」內閣政府所封閉的「真理報」上（第六十八號，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五月二十八日」出版），我已經指出，關於這一點（自然遠不止這一點），俄國所謂革命的所謂民主派底所謂社會主義的代表們，都已經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了。不用說，這批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勾結而成立「聯合」政府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當然是掩耳不聞的。

還有一點是極端重要值得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拿出事實，舉了最確切的實例，來駁斥那種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普遍的偏見：以為聯邦共和國必然要比集中的共和國更自由些。這是錯誤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的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共和國的事實，已足以推翻這種偏見了。真正的民主集中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較之聯邦共和國是要大些，換句話說，歷史上所知道的最大量的地方的、特別區等等的自由，要算是集中共和國，而不是聯邦共和國。

在我們的黨底宣傳和鼓動中，無論過去或現在，對於這種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共和國與集中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都沒有充分注意，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而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版上所作的序言中（這篇序言是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作的，最初在『Zürcher Zeitungsblatt』雜誌上發表過），除了關於對國家的態度有聯繫的問題，作了許多有興趣的附帶的指示之外，他關於『公社』問題底教訓又做了一個極顯著的撮要的。被『公社』以後二十年來的經驗所加深，而且是特別用來攻擊那些盛行於德國的『對於國家的迷信』，可以很真確地稱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最後的談話了。

恩格斯說：

『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了；因此，對於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工人得勝的革命之後，就有新的鬭爭，其結果是工人失敗。』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驗之總結，這個總結既極簡短又極明瞭。問題底實質——同時在國家問題中亦然（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得非常切要中肯。正是關於這實質，無論那些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所影響的大學教授也好，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好，都是默不作聲的。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位『孟萊維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蔡雷特利』，很元榮的（加文庫克式的光榮）洩漏了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秘密。蔡雷特利在六月二十二日（九月）的『歷史的演說』（註一七）中曾經洩漏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裝的決心，他並認爲這要決定

是他自己的，而且一般地是「國家」十二分需要的！

蔡雷特利於六月二十二日（九日）這次「歷史的」演說，當然是每一個一九一七年革命歷史家所可引來作為一種最好的證據，來證明蔡雷特利先生所領導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與國家問題有關係的附帶的指示，便是宗教問題。大家都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它的腐敗和日益機會主義化，對於那有名的公式，漸漸走入了一種庸人的曲解，這個公式就是：「宣佈宗教為一種私事」。依照他們這種解釋，這個公式好像是說，即使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宗教問題也是一種私事了！恩格斯對於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行爲，曾經加以反抗；他在一八九一年只是看到了他自己黨內的機會主義底最微細的萌芽，因此他的語氣是十分謹慎的：

「在「公社」中參加會議的，差不多只有工人或被人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它的決議都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或者這些決議所規定的一些改良，會被共和派資產階級由於卑鄙怯懦而摒棄，但是這些改良却構成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的基礎。對於國家而言，宗教僅僅是一種私事——這個原則底實現就是如此。或者「公社」所發佈的決議，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的，並且一部分是深深地破壞舊社會制度的……。」

恩格斯有意地在「對於國家而言」這幾個字上加着重點，這對於德國機會主義是一個中肯的當頭棒喝；因為它公然宣稱過，對黨而言，宗教是一種私事，因此把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黨降到最后平凡的「自由思想的」小資產階級底水平線上去；這種小資產階級準備承認非信教的狀態，但是却又拒絕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作黨性的鬥爭。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未來的歷史家，在研究它在一九一四年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的時候（註一八），在這個問題上，能找到很多有興趣的材料；從黨的思想上的領袖考茨基論文中大開門戶讓機會主義進來的曖昧的言論起，以至於一九一三年黨對（*Das Von-Kirche-Bewegung*）（與教堂分立的運動）為止。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如何給予奮鬥的無產階級做出「公社」教訓底總結。

請看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是那些教訓：

「……恰恰是以前的集中政府底那種壓迫政權——軍隊、政治警察、官僚，都是拿破崙在一七八九年所手創而為以後每個新政府所利用來作為反對自己敵人的最如意的工具——恰恰是這種政權，本應該像在巴黎一樣，在法國到處都要覆頌的。

「公社」不能不承認，一旦工人階級得到統治，就不能再去使用舊的國家機器，工人

階級爲要避免再失去剛才得到的統治計，第一、不能不剷除那至今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切舊的壓迫機關；第二、就該保證自己，提防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們，宣告他們一切人，沒有任何例外，都是隨時可以撤換的……。」

恩格斯再三鄭重說明，不僅在君主國，就是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它仍保留着它那根本的特質：把官吏、「社會公僕」、國家的機關，變爲社會底統治者。

「……爲避免使國家和國家機關，從社會底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起見——這種現象在——向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教育的職位，統統都委任那些照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按選舉者底決議隨時可以撤消被選舉者的職位之權。第二，它給予那些官吏的薪金，不分職位上下，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靠的障礙物以防止那些獵取官職和野心鑽營的人們，即使「公社」沒有對代議機關的議員們頒佈絕對服從的命令，也已能防止那些野心鑽營的人了。」

恩格斯這裏講到這樣一個有趣味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上徹底的民主主義一方面變爲社會主義，而他方面它要求社會主義。因爲要消滅國家，必須把國家機關底職務，變爲監督和登記這樣簡單的手續，使大多數人民都能擔任，然後全體人民都能够擔任。再則，爲了要完全免除官吏中

的貪污現象，必須使那有「名譽」而無利可圖的國家服務中的職任，不能成爲跳到銀行或股份公司中得到大批收入的職位之方法——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常常有的弊病。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所犯的那種錯誤，（註一九），他們以爲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之下却是不要的。像這樣似乎很聰敏而實際上完全錯誤的論調，對於隨便那個民主制度（對官吏支付微薄的薪金這一點也在內）都是可以適用的；因爲澈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民主制都要消滅的。

這是一種詭辯論，正像舊時的笑話一樣：如果一個人的頭髮少了一根的話，那末他是否要變成禿頭？

發展民主制到底，研究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際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革命爭鬥中的基本任務之一。若民主制是一件單獨的東西，那末沒有一個民主制能够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從來不會「單獨」起來的，而一定是「總合」的，它也要影響經

* 名義上這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價格計算，約等於六千盧布。有些布爾塞維克提議在市議會中，薪水爲九千盧布，而不提議施行整個國家的最高薪金爲六千盧布（這個數目是充足的）這

是不可容許的。

濟，助成經濟底改造，同時它自己又受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繼續說：

「……舊的國家政權底這個爆裂（*explosion*）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權來代替它，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很詳細地描寫過了。但是關於這個代替，這裏還有幾點須要簡單地再加以說明，因為正在德國對於國家之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移到資產階級甚至於很多工人之一般的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家底學說，國家就是「觀念底實現」，或者，如果用哲學的語氣來講，國家便是上帝在地上的統治，國家是永久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對於國家以及一切與國家有關係的東西之無上的崇拜，這種崇拜很容易穩固起來，因為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以為整個社會公共事業與利益的處置和保護，除了過去的方法，就是說，除了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辦理外，便沒有別的方法。人們以為假使他們不去迷信世襲的君主政體而成爲民主共和國底信徒，已經是做出非常有力的進步了。可是在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壓榨機，這一點在民主共和國是絲毫不弱於君主國的。在最好的情形之下，國家是無產階級在它爲階級統治而爭鬪得到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根。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正和「公社」一樣，不能不立即斬截這個禍根之極惡劣的方面，直到那在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培養出來的新

起的一代人，能够把國家一切無用之物拋到垃圾堆中去的時候爲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要他們在以共和國去代替君主制時，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切國家問題之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好像是特別對蔡雷特利和威爾諸夫那般先生們的一個直接的教訓，因爲他們在其「聯合」政府的實際行動中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無上的崇拜！

還有兩點要指出來的：（一）假使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國之下，國家之成爲「一個階級壓迫別個階級的壓榨機」，「是絲毫不弱於君主國的」，那末，這並不是說，壓迫的形式對於無產階級是不相干的，如像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訓」的一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鬭爭的形式，能够大大地幫助無產階級來作消滅一切階級的鬭爭。

（二）爲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能够完全拋棄國家底一切無用之物——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之破除問題相聯系的，下面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之破除

當恩格斯在說到「社會民主派」這個名詞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他曾連帶講到民主制之破除這一點。

他在一八七〇年代，關於各項問題，主要地是關於「國際的」內容作了各篇論文，在這個文

集底序言中（這個序言是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就是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作成的）他說，在他所有的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這個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派』，因為當時法國的蒲魯東派和德國的拉沙爾派，都自號爲社會民主派了。

恩格斯繼續說：

『……馬克思和我一樣，都認爲用這樣有伸縮性的名詞，來特別表明我們的觀點，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現在，情形不是這樣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派』）或者可以勉強過得去（*Mit Passieren*），雖然它對我們的黨，仍舊不確切的（*Unpassend*不適當的），雖然因爲黨的經濟綱領不僅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的，而且是真正共產主義的，黨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在破除一切國家亦即破除一切民主制，但是真正的黨底名稱（恩格斯加的着重點），絕不會完全與此黨相適合的：黨是在發展起來，而名稱依然照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他臨終之日依舊是忠實於辯證法的。他說，馬克思和我會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切當的黨名，但是那時沒有一個真正的黨，就是說，沒有一個廣大的無產階級的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真正的黨，但是它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它的科學上不正確的名稱，不要對它掩蓋起來，並且不要障礙它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該諸家會照恩格斯那種論調，引來安慰我們布爾塞維克：我們有一個真正的黨，它很順利地發跡着！即使像『布爾塞維克』這樣的一個無意義而又醜陋的名稱，除了表示一九〇三年，不律塞爾、倫敦代表大會。* 上我們得到了大多數這一個全屬偶然的事實以外，絕對沒有其他意思的名稱，也『可以過得去』……或許現在因爲一九一七年七八月間我們的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所通緝，遂使『布爾塞維克』這個名稱非常普遍非常光榮了，這種通緝，又表示了我們的黨在它真正的發展上完成了歷史上的極大的進步，現在就是我自己也許要遲疑不決，不敢去重提我在四月間變更黨的名稱的提議了。或許我要向同志們做一個『妥協』的提議：把我們的黨稱爲共產黨，同時把『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置諸括弧中……。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平常在國家問題的議論中，人們往往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而我們已經在上面順便提及的那個錯誤，就是說，人們每每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衰亡也就是民主制底衰亡。

* 即『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始則舉行於不律塞爾，然後遷倫敦，在這次會議上分裂爲『多數』與『少數』，即後來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

——校者

初次一看，這種論斷，似乎是十分離奇而不可了解的。甚至於有些人也許要發生這樣的恐懼：我們是不是坐待一種社會制度底到來，以便不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為民主制，本來就是承認這種原則的制度。

不，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相等的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一種國家，就是說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一部分人民對另一部分人民有系統的應用暴力的一種組織。

我們最後的目的，就是消滅國家，就是說，消滅一切有組織的有系統的暴力，壓迫一般人們的暴力。我們並不坐待那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底到來。但是我們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深信社會主義是要進化到共產主義的，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壓迫人們的暴力的需要，一個人服從別個人以及一部分人民服從別一部分人民的一切需要，都將隨之而消滅；因為人們將不需要任何暴力和任何壓迫而能習以為常地遵守社會生活之基本條件了。

爲要着重說明這個習慣底原素，恩格斯講到那新起的一代人：「它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培養出來的，它能夠完全拋棄國家底一切無用之物」——這裏所謂國家是指任何的國家，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也在內。

爲要講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研究國家衰亡底經濟基礎。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維白拉克的信，此信只在
一八九一年刊登於『*Neue Zeit*, IX. I. 並翻成俄文出版單行本）中講得最爲詳盡。這本出色著作中
批評拉沙爾主義的辯論之部，遮蔽了論述的一部，就是：共產主義之發展與國家之衰亡兩者間的
關係底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把馬克思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白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致培培爾的信，作一表面上的比較，似乎馬克思帶有『國家派』的成分，要比恩格斯更多，兩
人對於國家的見解，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向培培爾提議拋去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在政綱中完全廢去國家的字樣，而以『公社
』代之；它甚至又宣佈說『公社』實際上已經不是『國家』一字原意上的國家了。馬克思則不

然，他曾經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底國家』，就是說，似乎他承認甚至在共產主義之下，國家也是必需的。

但是這樣的見解是根本錯誤的。如果更深刻地研究下去，便知道馬、恩兩氏對於國家及其衰亡之見解是絕對一致的，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恰恰是指正在衰亡的國家而說的。

很明顯的，將來『衰亡』底日期的規定，是無從說起的，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表面上的差異，是由於他們所研究的題目底不同和探討底目的有所區別而發生的。恩格斯底任務，在於把普通對於國家的流行的偏見（拉沙爾也是一樣同意的）之全部荒謬性，明顯地、激烈地、大書特書地表示給培培爾看。至於馬克思則不過是順便提及這個問題，而主要的是側重在另一題目：共產主義社會之發展。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是以最激底、最完整、最精密、而又最富有內容的形式，來把發展論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這樣，他便自然要把這個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底將來的破產和未來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上去的。

試問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問題呢？

可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從資本主義之內產生出來，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之動作結果。馬克思絕對沒有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揣想一件

不可推測的東西的那種企圖。他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形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知道一物底來源，又知道此物變化的一定的方向。

馬克思最初便把「哥達綱領」中關於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中的糊塗觀念，先行掃除乾淨，他說：

「……現代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它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家中，它是離開中世紀制度而多少自由的，它依着每一國家歷史發展之特殊的條件而多少有所不同，它多少是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則跟着每一國界之不同而變化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是完全不同的。它在美國與英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實在是一種虛構。

「不管各個文明國家底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如何分歧，可是它們却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之上。所以它們具有某幾個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點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的國家」，以別於現在國家根基——資產階級的社會消滅時之將來。

「其次問題就是這樣：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取怎樣的一種形式呢？換一句話說，到共產社會的時候，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相似的社會職能遺留着呢？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

方法來答覆，無論幾百幾千次的把「人民」與「國家」幾個字去連接起來，而對於這個問題底解決，終究是毫無幫助的。……」

這樣馬克思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同時就給了本問題底提法，並且似乎對人警告說，爲要得到這個問題底科學的答覆，只能依據適當的科學材料。

這裏首先要指出由整個的發展論，整個的一般的科學所已經完全確定了的結論（這一點是爲烏托邦主義者所忘記，而且現在又爲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就是；從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歷史上必要有一個特殊的過渡階段。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着說：

「……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革命的轉變時期。同時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也是同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之外，便沒有任何別的國家。」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底分析，根據這個社會發展底事實，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的不調和性而獲得的。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它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且建立起它自己革命的專政。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多少有些不同了：從發展到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過渡，如果不經過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只有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可是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是把二種概念並列地提出來：「無產階級變爲統治階級」和「獲得民主」。根據一切上面所說的話，我們可以更正確地斷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民主制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資本主義社會最順利發展底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看見在民主共和國之下有一個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但是這個民主制是常常受着資本主義剝削之狹窄的範圍所限制的，因此實際上它常常只是爲着少數人，爲着有產階級，爲着富有者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每每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概相像的：自由只是奴隸主底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之故，被貧乏和窮困壓榨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以致他們「不暇過問民主制」，「不暇過問政治」；在平常的和平的事變潮流中，大多數人民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

之外的。

這種論斷之正確，證實得最為明顯的，也許要算德國的實例子，正因為在這個國家裏，立憲的合法性已經存在得很久，已經很穩固地存在幾半世紀（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了；在這個時期當中，社會民主黨為『利用合法性』而做的工作比其他各國都多，為把大批的工人組織成爲一個政黨所能做到的事，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那末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德國有政治覺悟和能有政治活動的僱傭奴隸之最大的比例有多少呢？一千五百萬僱傭奴隸中間，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而在這一千五百萬人當中，有三百萬人是組織在工會中的*！

爲極少數人所有的民主制，爲富有者所有的民主制，——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底民主制。若是更接近地來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在選舉權的『小事』（似乎是小事）當中（居住資格；婦女除外等等），無論在代表機關的技術中，無論在關於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中（公共建築物不是爲『窮人』用的！），以及在每日報章之純粹資產階級的組織中等，我們都可以看出層層的限制，而且是對民主制的層層限制。這種對於窮人的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看來似乎不關重要，——尤其是在那般自己從來不曉得有什麼貧乏也從來沒有同

* 根據一九一七年的統計。

被壓迫階級底羣衆生活接觸過的一般人底眼中（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得不關重要，但是總算起來，這些限制都要將窮人擯出於政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民主制這個本質很好地抓住了。當他分析「巴黎公社」底經驗時會說：給被壓迫者數年一次去決定，壓迫階級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壓迫他們！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必然是偏狹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此它是完全虛偽的，欺騙的。但是從這個民主制進到「逐漸擴大的民主制」，這一種進展，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的教授先生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和平穩的。決不如此，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種進展，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而且非此決不能成功，因為要打倒剝削者資本家的抵抗，沒有其他的人，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組織被壓迫者先鋒隊爲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擴大民主制就算了事。除了大大地擴大民主制——第一次成了貧民的民主制，民衆的民主制，而非富人的民主制——之外，無產階級專政應該對於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的自由，加以許多剝奪。我們爲要使一切從僱傭奴隸之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壓倒這般人，我們必須用武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要用鎮壓、用暴力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民主，這是很明顯的。

讀者還記得，恩格斯在他給培培爾的信中會很顯著地講明了這一點，他說：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要壓倒自己的敵人；到可以講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對廣大的民衆實行民主制而以暴力鎮壓民衆底剝削者和壓迫者，就是說把他們摒棄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民主制的變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地打破了，資本家也完全消滅了，階級也不復存在了（就是說，社會底組成分子不其對社會的生產手段的關係上不復有差別了），只有那時，「國家才泯沒，而可以講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能够實現，並且沒有任何的例外。而且只有那時，民主就開始衰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已經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從資本主義剝削的無數慘酷、野蠻、苦澀、卑鄙行爲中解放出來了，人們將逐漸習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數百年來人所熟知的，數千年來一切文件上所重複裁明的規則：不要暴力，不要強制，不要服從，不要名爲國家的強迫的時時機關，也能遵守這些規則了。

「國家衰亡」這句話，是用得很適當的，因爲它既能表明過程之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的自
然性。惟有習慣，才能够而且無疑義地能够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爲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引起
憤恨，反抗，暴動和造成鎮壓之必要的東西，人們就很容易習慣遵守自己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規

賤。這種情形，我們在我的週圍，已經看見過不知幾百萬次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看到一種殘酷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只爲着富人的，爲着少數人的。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無階級專政，第一次把民主制給民衆，給大多數民衆，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唯有在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民主制，但是它越完善，便越快成爲無用的東西，而自然地衰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着與國家原意相符合的一種國家，就是說一階級鎮壓別一階級，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一個特殊機器。很明顯的，要完成這樣的一種有系統地以少數剝削者壓迫多數被剝削者的事業，就需要一種極端兇惡和殘酷的壓迫，就要汗洋的血海，經過這種血海，人類遂陷於奴隸制、農奴制和僱傭工制的境遇。

再則，在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鎮壓還是必需的，但這已經是多數被剝削者加於少數剝削者的一種鎮壓。一副特殊的鎮壓器具和一個特殊的壓迫機關——「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一種過渡的國家，和原上的國家是迥然不同的，因爲以大多數過去的僱傭奴隸去鎮壓少數的剝削者，是一件比較容易和比較簡單而順乎自然的事情，其中的流血也必然比較從前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奴隸的暴動時，要大大地減少，人類所受的損失將大大地減輕。這種事情與民主制之普及於極大多數民衆完全符合，且民主制普及之廣泛，使施行鎮壓的特殊機器之需

要，也開始消滅。不消滅，剝削者沒有一種極複雜的機器以執行這個任務，就不能鎮壓民衆，但是民衆要鎮壓剝削者，只要用種很簡單『機器』，或者差不多不要什麼『機器』，不要用什麼特殊的機關，只要簡單的用羣衆武裝的組織（例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預先在這裏指出）就够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使國家完全不需要，因為那時沒有人需要壓制——這裏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的，是指那向某部分人民所作的有系統的鬭爭而言的。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絕對不否認個人底過分行動之可能與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一點，絕對用不到特殊的鎮壓機器，特殊的機關，武裝的民衆將自己負此責任。這種責任，好像在現社會中一羣文明人，去和解嚴打者和禁止強姦婦女那一類的行動一樣的輕易和簡單。第二，我們知道，破壞社會生活規則的那一種過分的行動，其主要的社會原因，是由於剝削民衆，民衆陷於饑寒貧困所致，且這個主要原因除掉，過分行動也就必然會開始『衰亡』的。其速率和程度如何，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它的終歸於衰亡，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分行動一衰亡，國家亦即隨之而衰亡。

關於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之低級和高級階段（程度，段落）間的區別上，現在可以確定的地方，馬克思不陷入烏托邦，可是同時却有更進一步的確定。

三 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盡地駁斥了拉沙爾的觀念，後者以爲在社會主義之工人可以獲得「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生產品」。馬克思指明從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一部分作爲後備基金，擴大生產的基金，補償已「損壞」了的機器等等，然後再從消費品中，取出一筆爲管理經費、學校、醫院、長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沙爾那樣應用含糊不明的，籠統的語句（全部勞動生產品歸之工人），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怎樣經營事業，有一個很嚴正的估計。馬克思對沒有資本主義的那種社會底生活條件，作具體的分析；他說：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黨底黨綱時）「所要討論的，並不是一個已經在它自己基礎之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這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知識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它是從這個舊社會底胎胞中產生下來的）底痕跡。」

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下來而各方面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就稱它爲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手段已經不是個人

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體社會了。每一個社會組成員做某一部分社會必需的工作，就從社會領得一個證書，證明他已經做了若干的工作。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得從公共的消費品貯藏所中去領得一定量的生產品。除去應該歸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之外，每一個工人給社會多少，他就從社會獲得多少。

這樣，似乎什麼都「平等」了。

但是當拉沙爾觀察這樣的社會制度（即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它為共產主義之第一階段）時，說這是「公平的分配」，這是「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生產品的同等權利」，那末，拉沙爾是錯誤的，且馬克思解釋他這個錯誤說：

「我們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是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它像別的權利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一切權利都是用同一度量施行於事實上各不相同與各不相同的各種人們身上；因此，『平等權利』就是平等的破壞，亦就是不公平。」

實際上，每一個人既經盡了像別人一樣多的社會勞動，他就可以獲得社會生產（除了上面所說應作基金的一部分之外）之相等的一份。

雖然如此，各個人之間還是不平等的：一個人強些，另一個人弱些；一個是結婚了的，另一個人還沒有結婚；一個人兒女多些，另一個人兒女少些，諸如此類等等。馬克思做的結論就是：

「……在平等的勞動之下，也就是說在消費品公共貯藏所中領取平等的部分之下，實際上，一個人所獲得的多於另一個人的，一個人能够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爲要避免這種現象，權利款應當不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了……。」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還不能實現公道與平等；財富的差別依然存在，且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爲那時要把生產手段，——工廠、機器、土地等等奪來換爲私有資產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打破了拉沙爾那種小資產階級性的關於「平等」與「公道」的混淆不明的空話，他同時便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首先不能不消滅的，只是生產手段操在私人手中的這個「不公平」。而這些生產手段還不能立刻消滅後來的不公平，即是「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所構成的不公平。

庸俗的經濟學家——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在內，「我們的」杜幹*也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人們間的不平等，和「空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現在看見，這樣的譴責，只是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之極無知識。

馬克思不僅十二分確切地估量到人們間不可避免的平等，而且還認定僅僅把生產手段轉變爲全體社會的公產（就是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夠除去分配底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不平等，這種權利還是繼續統治的。因爲生產還是「按工作」來分配。

馬克思又繼續說：

「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了長久的分娩的苦痛之從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下來的階段中是必不可免的。權利永不能超過經濟的結構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的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中（普通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並沒有完全消滅，所消滅的只是一部分，只限於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的部分，也就是說，只是對生產手段的關係而言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承認生產手段是個人的私產，社會主義把它們變為社會的公產。在這一點上，而且只有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是不復存在了的。

但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之其他部分，依然是存在的，它現在為社會各個分子間生產品分配和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誰不做工，誰就不應有飯吃」，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勞動可以獲得等量的生產品」，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且這還沒有消滅給不同的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的不等量）勞動以等量生產品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缺點」，但是這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要不陷於

托邦主義，我們就不能以為推倒了資本主義之後，人們就立刻會知道爲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權利底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消滅，並沒有立刻就造成這種變遷底經濟前提。

然而，那時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標準之外，便沒有別種標準。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中，國家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手段之公有，保持着勞動底平等和生產品分配底平等。

到了既沒有資本家，又沒有階級，因此對任何一個階級的壓迫也不可能的時候，國家也就衰亡下去。

但是國家還沒有全部死亡，因爲那時還保存着決斷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要國家完全衰亡必須有完整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

馬克思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上，在強迫着人去服從分工的那種強迫情形消滅後，同時，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那時勞動將不成爲僅僅是生活之方法，而它本身將成爲生活之第一需要；那時的生產力將隨着各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社會財富來源，也將急流似地湧現出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狹隘眼界，才

能完全破除，而社會也才能在它的旗幟上寫道：「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以看出恩格斯說話的完全的正途；他會絕不容情地嘲罵把「自由」與「國家」等字樣聯在一塊的荒謬。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是不會有自由的。一旦有了自由，國家就不會存在了。

國家完全死亡之經濟基礎，為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在這種發展之下，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對抗性將消滅，因此將消滅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的根源之一，這一個根源，不能僅僅靠生產手段之轉為公產，不能僅僅靠剝奪資本公司，立刻就可消除的。

這種剝奪，給生產力有極大的發展之可能。我們看見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是怎樣阻礙着這種發展，以及在現在所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之上可以怎樣快地把這個發展推往前進，故我們得十二分自信地說，剝奪資本公司，必然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底前進的速度如何，何時它能夠達到打破分工，打破勞心與勞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何時能修達到使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是不能知道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的，只是關於國家之必然的衰亡，特別着重說到這個過程底長久性，以及這個過程之依靠於共產主義高級發展之速度，至於衰亡底時期問題，或衰亡之具體的形式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現在還沒有。

當社會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的時候，就是說，當人們已經慣於遵守社會生活之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動生產率發展得很大，以至他們都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的時候，國家才會完全衰亡。「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之狹隘限界」逼得人們像希洛克（註二十）一樣去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他人多做半小時的工作，我不要比他人少得報酬——這樣的狹隘眼界，到那時將完全消除了。社會對於那分配給每一個人員生產產品數量底標準，在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各人皆得「按其所需」而自由地取之於社會。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容易說這樣的一種社會秩序爲「純粹的烏托邦」，且譏笑社會主義者約許各人有權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茵、汽車、鋼琴等等，而對各個公民底勞動，沒有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的「學者」，還是應用着這樣的譏嘲來應付問題，但是這樣他們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和他們對資本主義之貪圖利己的擁護而已。

他們之所以愚昧，是因爲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想到「約許」共產主義發展之高級階段的到來，不過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預知它要到來，可是這個階段所需要的，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爲波美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能够「徒然」揮霍社會財富的積貯却提出不能執行的要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級沒有達到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由社會和國家方面來嚴格地監

督勞動量和消費量，不過這個監督必須從剝奪資本家，從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而且這個監督不該由官僚的國家，而應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施行。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蔡雷特利、威爾諾夫以及他們的伙伴們等等）對資本主義之企圖利己的辯護，就是在他們把關於遙遠的將來的爭辯與談論來代替目前政治上的緊要和急不容緩的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整個的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的全部工作都隸屬於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當博學的教授和跟着他走的庸人，以及那班蔡雷特利和威爾諾夫先生們說什麼「無理的烏托邦」，說「布爾塞維克無根據的允許」說「社會主義施行的不可能」等話的時候，他們所指的實質上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至於共產主義的「施行」不但沒有人允許過，而且想都沒有想過，因為「施行」共產主義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這裏我們已經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科學上的區別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上面所引他論及「社會民主派」這個命名的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提到過。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間的政治上的區別，將來大概是很大的，可是在目前資本主義之下來加重注意這種區別，實在是很可笑的，而把這個區別，看作頭等重要問題，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能夠辦到（如果在克魯泡特金、格拉佛、柯爾業利遜以及無政府主義底其他「明星」他們

學「普列哈諾夫的樣式」，變爲社會國家主義者之後或照一個尙保有良心和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革氏的說法，他們變爲「無政府掘壕隊員」之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沒有受到一點教訓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間之科學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手段變爲公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此處也是可以通用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底解釋之偉大的意義即在此處，他也是一貫地應用唯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一種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絕不用咬文嚼字的空想和虛構的「定義和許多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只是對於那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成熟上的階段的東西加以分析。

在第一階段或第一時期中，共產主義還不能達到經濟上的完全成熟，亦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底一切習俗和痕跡。因此我們看到，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中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狹隘眼界」那種有趣的現象。在對消費品底分配上，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亦自然必以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爲前提，因爲如果沒有一個能够強迫人去遵守權利標準的機關，則權利便等於零。

這樣，在共產主義之下，在某個時期以內，不僅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存在着，甚至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也還保留着！

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荒謬之談，或者只是一種辯證法的玩弄聰明！凡是絕對不用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之異常深刻的內容的人們，常常這樣來歸罪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上，舊物底殘餘還留在新物之內的事實，無論自然界或社會中，到底的實際生活都指示給我們看了。馬克思並不是隨意把片地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挪入到共產主義中去；他只不過指出在一個從資本主義底胎胞中所產下來的社會裏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事實罷了。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爲自己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但是民主制却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的階段之一。

民主制的意思就是平等。如果我們從消滅階級的意義上去正確的了解平等，則無產階級爲平等和平等的口號而鬥爭。有何等重大之意義，是明顯的。但是民主制的意思，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在社會全體人員對於生產手段領有的平等獲得了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獲得了之後，在人類的面前，必然立刻會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平等的更進一步的問題，也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問題。要經過怎樣的階段，應該用那些實際方法，人類才能够達到這一個最高的目的——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够知道的。但有一點至關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說明平常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無限止的撒謊，在他們看

來，似乎社會主義是一種無生命的、僵死了的、萬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却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各方面才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羣衆的前進，在這前進運動中，起初有大多數人民，繼則全體人民都來參加。

民主制是國家底形式——是國家的各種形態之一。因此，同一般的國家一樣，民主制也是對於人們的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底使用。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是在形式上承認一切公民的平等，承認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決定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而這一點又與下面的情形有連帶關係的；在民主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它使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以反抗資本主義，而且使它能夠去破壞和打碎，並且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就算它是共和政體的）：常備軍、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機關；可是這依然是國家機關，不過它是武裝的工人羣衆，這些羣衆由此過渡到爲全體人民參加的民警。

此地是「數量變爲質量」的：民主制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時，它就跳出了資產階級社會底圈套，而開始把社會主義的改造。假使真正全體人民都來參加國家的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又造成使真正「全體人民」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先決條件。屬於這些先決條件的，是已經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中實現了的「人人皆識字」；其次由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等等所造成的千百萬工人之「有訓

練和有紀律」。

在這些經濟的先決條件之下，就完全有可能立刻在二下四小時以內，推翻資本家和官僚，而用武裝工人或武裝全民來代替他們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生產品（不要把監督和計算的問題與受過科學教育的工程師，農業學家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受資本家支配而工作，可是明天他們將受武裝工人的支配而更好地工作）。

計算和監督——這是爲「佈置」和使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得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辦法。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僱員和工人了。全部事情就在使他們都做平等的工作，正確地遵守工作底標準，而得到同等的報酬。計算和監督這種事情，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了絕端簡單化的地步，簡直變成了檢查、登記和發出接收異常簡單的手續，這種工作只要識字和懂得加減乘除的人，都能夠擔任的*。

當大多數人民到處起來親自實行這種計算並監督資本家（那時他們已經變爲服務人員了）和知

* 當國家大部分的職務，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計算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務就由政治職務變爲簡單的管理職務了。」（參閱本書第四章第二節，關於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識分子先生們（這些先生們還保留着資本主義的習氣）的時候，那時這種監督就真正成爲普遍的、一般的和全民的了，那時誰也逃不掉這種監督了，人們將「無所隱避」了。

整個的社會將成爲一個辦事處和一個工廠，大家都同等勞動，獲得同等工資。

但是這個「工廠」的紀律，無產階級在征服了資本家和推翻了剝削者之後要擴充到全社會去的紀律，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最後的目的，它只是爲要達到澈底肅清社會上一切資本主義剝削底卑鄙與醜惡和爲繼續向前發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人員，或大部分的社會人員，自己學得了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操在自己掌握之中，已經「佈置了」對於極少數的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願意擁護資本主義的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和對於被資本主義深深惡化了的工人們的監督的時候，——從那時候起，對於任何的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了。民主制愈是完備，則它變成廢物的日子便愈近。由武裝工人所組織的「國家」以及「從國家的原義上講已經不是國家」的「國家」，愈是民主化，則一切的國家的開始衰亡也愈是迅速。

因爲當大家都學得管理，而且實際上將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般寄生蟲、公子們、騙徒們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資本主義習俗底擁護者」的時候，——那時要違背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變成異常困難，變成最罕見的例外了，這種違背必然會引起很快和很嚴

屬的處罰（因為武裝的工人都是從事實際生活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份子；他大概不讓任何人與自己開玩笑），這樣，使人們遵守社會生活底簡單的基本規則的必要，也將很快就成爲一種習慣了。

到了那時候，便將大開門戶，從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隨着完全衰亡下去。

第六章 機會主義者之糟蹋馬克思主義

國家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同一般的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長大的過程中，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顯著的事件就是：他們即使在直接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竭力來躲避它，或者不注意它。

整個的看來，我們可以說，把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避而不談，對於機會主義者自然是利，而且還培養了機會主義——可是其結果就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完完全全糟蹋了馬克思主義。

爲對這個可憐的過程加以說明（縱使是很簡單的說明）計，我們就拿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理論家普列哈諾夫和考茨基來說一說吧。

一 普列哈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哈諾夫在一八九四年曾經爲了討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特別著了一本德文的小冊子，命名爲「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當時普列哈諾夫以狹狹態度來發揮這個題目，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鬭爭中最迫切最及時和政治上最重要的一點，即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和一般的國家問題，完全置之不理。他的小冊子分成兩部份：一是歷史的文藝的部分，其中包含着許多關於斯蒂納、蒲魯東等底思想史的有價值的材料；二是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着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並無區別。

這裏事實的聯系，是對於普列哈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整個行動最珍奇、最特出的：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普列哈諾夫正是表示了自己是個半幻想家，半庸俗學者，在政治上是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後面跑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曾最詳盡地說明了他們對於革命與國家的關係的見解。當一八九一年馬克思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出版時，恩格斯曾寫道：「我們（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正在同巴枯寧以及跟着他跑的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戰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世界大會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曾經企圖把「巴黎公社」宣稱爲他們「自己的公社」，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而且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此等教訓底分析。對於那些具體的政治問題：

是否要去破壞舊的國家和機器和用什麼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簡直沒有給一個甚至大概接近於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把整個的國家問題丟開不講，並將馬克思主義在「公社」前後之全部的發展，都置而不問，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墮入機會主義的深坑中去。因為，機會主義正是最要求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這已經是機會主義底勝利了。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之翻成俄文的譯本，自然比任何別國文字都要豐富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說過笑話，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要比在德國多些。（這裏我們可以附帶說一說，就是這句笑話比說這笑話的人們所疑怪的更含有很深切的歷史意義：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人異常有力地、亙古未聞地要求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黨底著作，因此在俄國，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底數量之多，誠為其他各國所不及，這樣就把更先進的鄰國底豐富的經驗移植到我們無產階級運動底新的領土中來了）。

除了對於馬克思主義之通俗的解釋以外，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及他們的首領培恩斯坦的論戰，使他在俄國特別出名。然而有一件事實差不多沒有人知道。假使我們要明白在一九一四至一

九一五年的最大危機時期中，考茨基怎樣墜入了最可耻的迷途和替社會國家主義辯護，那末我們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的。這個事實就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萊蘭和壽列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培恩斯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都德牙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雜誌，維護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見解的雜誌，曾不得已與考茨基爭辯，而宣佈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上所提的決議案是『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案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柔和的並且調和的。還有一些用德文出版的考茨基底信札，也足以證明他在起來攻擊培恩斯坦之前，他是表示了同樣的動搖。

然而還有一個含有莫大意義的情形，就是在我們現在研究考茨基之最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叛變底歷史時，我們便可以看到，在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中，在他的解釋問題的方法中，他恰恰對於國家問題有系統地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攻擊機會主義的一部大著作，即他著的『培恩斯坦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培恩斯坦。但請看最特出的地方是什麼。

培恩斯坦在他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斥馬克思主義為『白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自由資產者和機會主義者數千百次重複這種指斥，來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代表——布爾塞維克。而且，培恩斯坦特別注重於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竭力想把

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教訓的觀點，去與蒲魯東的觀點混而爲一（我們已經知道，他這種企圖是完全沒有成功的）。培恩斯坦會特別注意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特別着重說明的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說：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培恩斯坦很「喜歡」這句箴言，所以他在自己著作中把它至少重複三次，可是把它完全曲解了，把它變成了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所要說的就是，工人階級應該破壞、打碎、炸燬（*St. reagenne* 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整個的國家機器。可是在培恩斯坦看來，以爲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要反對在奪得政權時的過分的革命性。

對馬克思思想之再愚蠢再醜陋的曲解，連想也想不到了！

試問考茨基在他對培恩斯坦主義的最詳盡的辯駁中，會取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底全部深奧之處。他引用了上面所摘引的恩格斯給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就說，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是一般的講來，它是能够掌握這個機器的——考茨基所說的話就盡於此了。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就把「破壞」國家機器作爲無產階級革命之任務，

而培恩斯坦把與馬克思底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去戴到馬克思頭上——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其結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問題之最重要的差別，就被考茨基抹煞了！

考茨基「反對」培恩斯坦時寫道：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解決，我們可以完全泰然自若地待諸來日。」（見德文版第一七

二頁）

這並不是反對培恩斯坦的論戰，而是實質上向他讓步，是向機會主義投降：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要求的，除了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之任務的根本問題「完全泰然自若地待諸來日」之外，並不要別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在四十年過程中，致誨無產階級，說它應該打破國家機器，可是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目睹了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他便用欺詐的手段，拿破壞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去代替要不要破壞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辯駁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的真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作為護符，以救自己！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倆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準備工人階級來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有一條鴻溝。

我們拿考茨基比較成熟的著作來看，這部著作大部分也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底錯誤的。這就是他那命名為「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中，拿「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統治」的問題，作爲他特選的題目。他在這裏說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話；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忽略了。在該小冊子內，著者到處都說到奪取國家政權，却並不繼續發揮這點，這就是說，他選擇的措詞，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爲他承認奪取政權可不破壞國家機器。馬克思一八七二年在「共產黨宣言」底綱領上曾經宣佈爲「陳腐」的東西，到了一九〇二年恰恰被考茨基所復興起來了。

在該小冊子中，又有特別一節發揮「社會革命之武器與形式」。在這一節當中，他講到羣衆的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強大國家勢力之工具如官僚和軍隊」等，但是關於「巴黎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很明顯的，恩格斯反對「尊崇一國家，而警告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考茨基提出這樣的意見，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的綱領」；他又敘述這個綱領底條目。可是一八七一年對於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這一問題，有了什麼新的貢

飲，他却不一辭。考茨基說些這樣「昂然」動聽的茶餘飯後之談來了事：

「很明顯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革命本身是需要一個長期的極深刻的鬭爭，這個鬭爭已經能够改變我們現在的政治和社會的結構。」

毫無疑義的，這個「很顯明的」真理，和馬吃麥子，窩瓦河流入裏海一樣，同是「很明顯的」。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極深刻的」鬭爭一類的話，來把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最緊要的問題忽略過去了；這個問題就是：對於國家和民主制的關係上，與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無產階級革命底「深刻之處」，究竟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

忽略了這個問題，考茨基事實上對於這最重要的一點，就實行向機會主義讓步了，同時在口頭上却揚言「機會主義者宣戰」，又着重指出「革命思想」底意義（如果怕拿革命底具體教訓去向人宣傳，那末這個「思想」是否很有價值呢？）；或者又說「首先是革命的唯心主義」，或者工宣稱，現在英國工人「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可以並肩地存在着形式十分不同的企圖：有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的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這裏民主的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一種形式：工人們選舉代表，

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的機關，而這個國會性質的機關就規定工作條例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有的可以交工會辦理，有的可以根據合作社的原則設立起來。」（見一九〇三年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及一五頁）

這種議論是錯誤的，它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巴黎公社」底教訓的例所說明了的，是要退後一步。

假使「官僚的」組織是必要的話，那末從這個觀點來說，鐵路和大的機器工業底一切企業，任何工廠，大的商號以及大的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之間，都沒有絲毫區別。在一切這些企業中，技術需要極嚴格的紀律，極大的準確性，以執行分配每人的那部分工作，不然就有機器或生產品遭受損壞或整個企業爲之停頓的危險。在一切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的機關」。

但是一切的關鍵就在這裏：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機關」，却不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那種意義的國會。一切的關鍵是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機關」，却不是僅僅「規定條例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像考茨基所想像的一樣，他這種思想是沒有超出資產階級代議制底範圍之外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機關」，當然要規定條例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却不是「官僚的」。工人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就要破壞舊的官僚機

歸，要根本毀滅它，澈底剷除它，而以這些工人們和職員們組織起來的新的機關來代替它，爲防止這些人變爲官僚主義者起見，必須立即採取相當的辦法；這些辦法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了的：（一）他們不僅是被選舉的，而且無論何時都可以更換；（二）他們的薪水不能高於工人底工資；（三）要很快的過渡到使大家都來執行監督和管理底職務，使大家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使無論何人也不能成爲「官僚」了。

考茨基完全沒有去思索馬克思底說話：

「『巴黎公社』並不是國會的，而是工作的團體，它同時又是立法兼行政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懂得把民主制（不是爲着民衆的）和官僚制（反民衆的）聯成一氣的資產階級的代議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之間的區別；無產階級的民主制要立即採取辦法來澈底地剷除官僚制，而且能够把這種辦法應用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滅爲止，直到爲着民衆的民主制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的對國家的「尊崇」，對官僚主義的「迷信」。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和最優的一部攻擊機會主義的著作，就是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還沒有俄文版，因爲它是一九〇九年，在俄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爲該書並不是論到的一般的革命綱領問題，像一八九九

年攻擊培恩斯坦的那本小冊子一樣，不是說到無定期的社會革命底任務的，像一九〇二年的「社會革命」那本小冊子一樣；而是講到具體的條件，這些條件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底紀元」正在到來。

考茨基肯定地指出一般的階級矛盾底劇烈和在這方面有特別大的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七年的革命時期」之後，在東方開始着同樣的自一九〇五年起的時期。世界大戰來得異常之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了的革命了。」「我們已經進到革命的時代了。」「革命的紀元正在開始。」

這些言論是十分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爲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答應了作什麼，而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它（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怎樣不符前言的一落千丈了。

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着：

「由現在的情勢可以發生這樣的一種危險：就是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很容易被視爲更溫和的——而實際上我們却沒有這樣溫和的。」

但是實際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表現得比人所感覺到的還要更溫和些，更機會主義些！還有更特出的一點，就是雖然他有這些肯定的言論，說革命紀元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

自稱爲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文完全避開了國家問題。

把這些對於規避問題、緘默、掩飾都總結起來，其結果便必然是完全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

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以考茨基爲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這樣說過：我保持着革命觀念（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新的革命紀元之到來（一九〇九）；但是一旦提到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任務問題的時候，我畢竟是要違背馬克思選在一八五二年已經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的（一九一二年）。

在考茨基同班業苦克的論戰裏，他恰恰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三 考茨基與班業苦克的論戰

班業苦克出來反對考茨基，他是『急進左派』底代表之一，這一派中會有盧瑟堡、拉狄克等，他們堅持革命策略，大家確信考茨基是在毫無原則地在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動搖着，是在跑到『中立派』底立場上去。這個見解之正確已經被歐洲大戰所證明了。在大戰期中，『中立派』（人家稱它爲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主義』派，已經表明出它本身全部可憎的卑鄙。

班業苦克在他論及國際問題的「羣衆行動與革命」這篇論文（一九一二年「新時代」第三十卷第二號）裏面，斷定考茨基底立場是「消極的急進主義」底立場，是「不活動的等待底理論」。

「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六一六頁）

這樣的提出問題，班業苦克就談到了我們所注意的那個問題：即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問題。

他說：

「無產階級鬭爭，不是單單爲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鬭爭……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和排擠（原文爲 *Aufhebung* 解散）這些武器……只有在國家組織完全毀滅（這是鬭爭底最後結果）之後，鬭爭方能終止。多數人的組織底超絕處，就在於它能消滅少數人的統治組織。」（五四八頁）

班業苦克用以表示自己的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是他的意思却是很明顯的。試看考茨基怎樣反駁他，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考茨基說：

「直到現在，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峙，是在前者要奪取國家政權，而後者却要破壞這個政權。班業苦克却想兩者兼而有之。」（七二一頁）

假設班業苦克底解說欠明晰性和具體性（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不關乎這一個題目的，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把班業苦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旨找着了；可是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而完全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糟蹋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爲自己的目的，他們承認，只有在社會革命消滅了階級之後，這個目的才可實現；而消滅階級又是促成國家衰亡的社會主義之建立底結果；無政府主義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把國家完全消滅，他們不懂得實現這樣的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就必須根本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代以新的「巴黎公社」式的由武裝工人底組織所構成的機器，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用什麼去代替它和無產階級將怎樣去利用革命的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利用國家政權和否認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利用現代的國家，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班業苦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正是馬克思曾經教訓過我們，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政權，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入新的人底手中，而應當破壞、打碎這個機關，而代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向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為照他的意思說，恰恰破壞國家機關這一層，是完全沒有的，而破壞國家機器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且考茨基替機會主義者作了一條逃路，是把「奪取」解釋為僅僅大多數的一種獲得。

為掩飾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計，考茨基便表示他的淵博，而「引證」一段馬克思底話來搪塞。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經說過：「國家政權手裏應有嚴格的集中力量」之必要；考茨基就堂皇正大地問道：班業苦克不是要破壞「集中主義」麼？

這不過是一套把戲而已，這也和培恩斯坦把馬克思主義對集中主義的觀點曲解為聯邦主義的觀點，並把他的觀點拿來與蒲魯東主義對聯邦主義的觀點混為一談是一樣的。

考茨基所用的「引證」，是與本題毫無關係的。無論新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集中主義的可能。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是集中主義，可是它是建築在「完全破壞」國家的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之上的。考茨基在此處所表現的行爲是騙子式的行爲。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的最著名的議論，置之不理，而却拿出文不對

題的引句來。

考茨基接着又說：

「……也許班業苦克要取消官吏底國家的職務吧？但是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尚且不行，何況在國家的行政機關內，我們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官吏，而是要求官吏民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勢，而是關於在我們奪得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鬭爭是不是要消滅（原文爲 *Abolish* 意即解散）國家政權。內閣中有那一部及其官吏是應當廢除的？」於是他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等等。「不，現在的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對政府的政治鬭爭所取消的……爲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將來的國家」主張採取何種的形式，而是關於我們的在野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七二五頁）

這是顯然的欺騙。班業苦克所提出的恰恰是革命問題。這在他的論文底題目上以及我們上面所引用他的一段文字當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可是考茨基跳到「在野黨」的問題上，他恰恰就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了。照他的說法，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我們是在野黨，至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事情，我們再來特別談論。革命就化爲烏有了！這恰恰就是機會主義者

所要求的。

我們所說的，不是「在野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鬭爭，而正是說革命。革命就在於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的國家機關，而代以一個新的由武裝工人所構成的機關。考茨基表示他對「內閣各部」的「尊崇」，但是試問我們爲什麼不可用在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之下的各種專門人才委員會，去代替「內閣各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內閣各部」存在不存在，要不要「專門家委員會」，或其他的機關；這些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是否要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千頭萬緒地聯系着，而且是極端腐敗的守舊的），抑或要破壞它而代之以新的機器。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而施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破這個機器，而用新的機器，來施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基本觀念，而考茨基把它隱藏起來，或者他完全沒有了解它。

他所提出的關於官吏問題，顯然證實他並不懂得「巴黎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的學說。

「即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尙且不行」

在資本主義之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我們非有官吏不行。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底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之下，因僱傭奴隸制，和民業之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

使民主主義成爲狹窄的、殘缺的、變相的。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職員們都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一種變爲官僚主義者的趨勢，就是說變爲脫離羣衆而站在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官僚主義底實質，就在這裏，在資本家沒有被剝奪和資產階級沒有被推倒以前，甚至於無產階級的職員之相當的「官僚主義化」也是不能免的。

從考茨基的說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有選舉的職員，那末即在社會主義之下，也有官吏，同時官僚制亦一樣的存在。這恰恰是錯誤的。馬克思恰拿「巴黎公社」做例子，而指示出，在社會主義之下，職員不是「官僚」，也不是「官吏」了，所以不是的緣故，因爲除施行選舉以外，還有隨時可以實行罷免權，而且還把他們的薪水與中等工人底工資相等，而且還以「工作的，即是立法兼行政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在實質上，考茨基攻擊班業苦克的一切論據，尤其是考茨基底特別巧妙的理由，說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尙且不行，這一些完全表現出考茨基把培恩斯坦反對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來重述一回罷了。培恩斯坦在他所著的叛徒著作「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中，反對「原始的」民主制底觀念，反對他所謂「空想的民主制」；反對絕對服從的命令、無報酬的職員、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這種「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培恩斯坦就借威伯所

解釋的英國職工會底經驗來作根據。他說，職工會在其七十年的「充分自由」的發展中（德文版一三七頁）相信了原始的民主制恰恰是不中用的，遂代以與官僚制混合的普遍的代議制了。

其實英國工聯會並不是在「充分自由」中發展，而是在充分的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中發展的，在這種制度之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惡意、暴力、欺詐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行為，非有種種的護步「不行」。在社會主義之下，許多「原始的」民主制底成分，是必然要復活起來的；因為，民衆在文明社會歷史裏第一次起來，不但能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還能獨立地參加日常的管理。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人都將輪流來管理，而且他們將很快地習慣於誰也不去管理。

具有天才的、批評的分析頭腦的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底實際辦法中看見了有一個轉變，這一點是機會主義者所害怕的和不愿意承認的，因為他們畏首畏尾或由於不愿意與資產階級堅決地脫離關係；這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不願意看見的，或者由於躁急的緣故，或者由於一般不懂得社會大變動底條件的緣故。「我們不應該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因為假使沒有內閣各部和官吏，我們怎麼辦呢？」——這是機會主義者底議論；機會主義者貫徹了庸人主義，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而且還死怕革命（如俄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害怕革命一樣）。

「我們只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就夠了，而無須去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的教訓，無

須去分析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那破壞了的東西」，——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底議論（當然此處是指最好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之流去步資產階級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便變成了失望底策略，而絕不是從事於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這種革命工作是無情的勇敢的，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底實際條件的。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巴黎公社』在數星期間，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實行上面所提到的辦法，以實現廣大的民主主義，剷除官僚主義。我們將效法公社社員革命勇氣，我們將在他們的實際辦法中看見他們對於具體、迫切而立時可以實現的辦法之指出，那時我們按這樣的方法前進，我們便能達到完全消滅官僚主義。

這種消滅之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縮短工作時間，提高羣衆到新生活中，使大多數人民所處的條件大家得能（無一例外）執行『國家的職務』，而這就使一切國家都要完全衰亡下去。

考茨基說：

『羣衆罷工底任務，無論何時都不在破壞國家政權，而只是在促成政府對於某種問題的讓步，或用一個歡迎（*Entgegenkommen*）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仇視無產階級的政府……』

可是無論如何，在無論何種條件下，這（無產階級之戰勝仇視政府）不能引起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比重底變動（Verschiebung）……在這裏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仍和從前一樣，就是用取得國會裏大多數的方法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政府主人翁。」（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這已經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了，已經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行動上放棄革命了。考茨基底思想不外乎要一個「歡迎無產階級的政府」——這比較一八四七年當「共產黨宣言」宣稱「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時候要倒退一步，而走向庸人主義方面去。

考茨基要實現其所愛好的主張與計得曼、普列哈諾夫和萬德威爾一流人「統一」，因爲這班人都是贊成爭取一個「歡迎無產階級」的政府的。

但是我們是要和這班違背社會主義的叛徒分裂，而爲毀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的，務使武裝的無產階級本身，變成政府。這是「兩個極大的異點」。

考茨基將同李謹、達微特、普列哈諾夫、波特列索夫、蔡雷利和威爾諾諾夫這般好伙伴們結合，因爲這般人全是主張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比重底變動」，爭取「獲得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他們這樣一種極可寶貴的目的，正是完全適合於機會主義者的，而且完全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的共和國底範圍之外的。

但是我們要和機會主義者分裂；整個的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會同我們一致奮鬥，這個鬥爭不是爲着「勢力比重底變動」，而是爲着推翻資產階級，爲着破壞資產階級的代議制，爲着「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爲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中，還有些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例如德國的「社會主義月刊」派（李謹、達微特、可爾白等，以及瑞典挪威的斯道寧和勃朗亭）、法國和比利時的潘列斯派和萬德威爾，在意大利黨內的都拉底、特列佛斯和其他右派代表們，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名爲「獨立工黨」其實是一向依靠自由派的），以及其他類似的派別。道般先生們，在議會工作裏和黨底刊物上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常有統治的作用，他們公然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行公開的機會主義。在這般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在實質上他們是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沒有多大區別。

我們根據這種情形，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第二國際」極大多數正式的代表們，已經完全墮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中。「巴黎公社」底經驗，不但被他們忘記，並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給工人們一個鼓勵，說現在快要到這樣的時候，那時候工人們應當起來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來代替它，這黨使工人們底政治統治變爲社會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底基礎；而他們

却教導羣衆以相反的東西，並且把『奪取政權』看作這樣，致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條後路。

當國家因帝國主義的比賽而擴大軍事機關，成爲吞食千百萬人民生命的軍事怪物，以解決德國或英國，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爭論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的關係問題之曲解和緘默，是不能不起一種重大作用的。

初版書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寫好的。我當時還預備好了第七章底題目：「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但是除了題目之外，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的政治危機所「妨礙」，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對於這種「妨礙」，只能表示快活。但是本章書（「論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出版也許要延擱得很久；不過其作文章來論「革命底經驗」，不如實地去做「革命底經驗」更爲快活，更爲有益。

著者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號（十一月三十號）於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
作，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

註釋

(一) 列寧底『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以單行本初次出版，在以後的各年中，在蘇聯以及在外國曾大批地出版。

這部著作，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主要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問題，即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一般國家的態度問題，尤其是對剝削者國家及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問題，破壞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在這一部著作中，列寧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國家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從戰前和戰時第一國際公開的右派機會主義者，暗藏的機會主義者以及中派理論家的曲解中清洗出來，並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死後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無產階級底經驗，尤其是根據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部分學說。『國家與革命』一書底出世，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革命實際底發展史上，是一樁最重要的，造成一個時代的事件。列寧這部著作，出版

於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發生後的次日，它說明並證實無產階級革命底道路。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道路以及這個國家之發展道路；這部著作，對於吾黨之領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建設，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及國際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鬭爭，始終是一部基本的、指南的著作。

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爭取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的鬭爭史上，列寧底『國家與革命』一書，直接繼續了過去的鬭爭來反對右派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這是一方面），反對『左派』對馬克思主義作無政府主義的曲解（這是另一方面）；這個鬭爭，還是由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所開始的，而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在布爾塞維克主義產生時就始終不倦的作了這個鬭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鬭爭中鍛鍊出了自己的學說，這個鬭爭，一方面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拉沙爾主義等），另一方面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等），反對『貧血的急進主義』（如恩格斯所說的）以及其他的所謂『左派』，這些『左派』不過是表現同一小資產階級狹隘性底另一方面，只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把資產階級的影響傳達給無產階級。

無政府主義派，曾妄想一舉而消滅資產階級國家，且隨着資產階級國家而消滅其他任何的國家，他們曾妄想一下子就消滅國家而建立無國家的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恰恰相反，他們曾指

明：如果執政的無產階級不是根據新的社會主義原則而比較長期地改造全社會，那末過渡到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正是爲着這個改造起見，無產階級就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時期中建立自己的新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鍛鍊出其關於國家及無產階級學說的時候，會無情地打擊拉沙爾和拉沙爾派底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就是：經過所謂「自由的人民國家」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經過普選制的資產階級國家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樣無情地打擊了拉沙爾主義承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就已形成的各西歐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者）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理論，打擊了他們那種不懂並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隨着第二國際社會黨內改良主義底發展，這種曲解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公開放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到十九世紀末葉已經達到很廣的範圍，日益普及於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和行動家（培恩斯坦主義等）。這種現象，沒有遇到西歐第二國際考茨基之流的理論家們底必要反抗，這些理論家會自命爲馬克思、恩格斯遺訓底擔負者，曾以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底資格來反對修正主義者（培恩斯坦等），而在事實上，當他們批評修正主義者的時候，恰恰在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上——國家問題、暴力革命問題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他們自己都犯了修正主義，好像列寧所指出的那樣

（見本書第六章），他們自己曾有系統地俗化了和抽空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內考茨基之流的理論家，佔了中派的立場（雖然大戰以前考茨基有過許多有價值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用俗化和抽空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內容的方法，幫助了第二國際各社會黨內公開的機會主義。在大戰時期，他們自己同公開的機會主義者手携手地把這些黨變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社會國家主義黨，他們自己變成了暗藏着的、因此是最危險的社會國家主義者。然後他們就同過去的修正主義者一塊兒變成了反革命、社會法西斯主義底理論家和領導者，而社會法西斯主義便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對世界革命、反對世界革命根據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的一個主要柱石。

列寧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的鬭爭，一開始就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鬭爭，並是為在新條件下——帝國主義條件下發揮這個理論的鬭爭，是擁護暴力革命、擁護馬克思主義對剝削者國家所持態度、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鬭爭。這個鬭爭，是在『俄國革命基本問題：如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態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無產階級領導問題，國會鬭爭和國會外的鬭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援助這個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斯大林）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鬭爭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因為『俄國革命會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焦點，』因為，『俄國革命底基本問題同時會是（而且現在還

是「世界革命底基本問題」(斯大林)，至於革命基本問題——國家問題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這個全部的鬭爭中佔了何等重要的地位，這點可從「列寧選集」的前數卷中看得出來，尤其是從「何謂人民之友」、「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司徒魯威書中對它的批評」、「做什麼」、「俄國社會民主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俄國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土地綱領」等等著作中，可以看得出來，這點也可從列寧所著「專政問題底歷史」一文中看得出來。

列寧底鬭爭，主要的是反對右派機會主義，尤其是反對培恩斯坦派、馬丁諾夫派、普列哈諾夫派及托洛茨基派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在俄國經過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曲解並俗化馬克思主義。同時這個鬭爭亦反對「左派」，特別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左派急進派」(盧森堡及其信徒)在這些問題上曲解馬克思主義。

在大戰年代，一部分俄國同志在國家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作了「左的」曲解，這部分人在其對於帝國主義問題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觀點上會接近於波蘭和德國的「左派急進派」。這就是布哈林、皮達可夫這一派人，他們用無政府主義觀點提出了國家問題。當他們以及波蘭和德國的「左派急進派」擁護他們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無政府主義立場時，就暴露了這個錯誤。他們反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並說在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口號對於無產階級黨是不適用的，

在社會主義時代是多餘的；他們完全忘掉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無產階級國家存在的時期；而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如果不承認和不實現民族自決權，就不能建設起來。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十分明確地採取了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布哈林在一九一六年的『青年國際』雜誌上，用 Zerkow 這個匿名出面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會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與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彼此相同。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一樣在原則上仇視一切的國家，他們兩者都提出『炸燬』國家這個相同的任務。這樣一來，第一他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無產階級必須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後，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換句話說，就是他否認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

第二他就消滅了無政府主義者之『炸燬』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間原則上的區別。就在那個時候，列寧在『思主義者之』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間原則上的區別。就在那個時候，列寧在『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第二期上，在『青年國際』一文中，對於布哈林在國家與革命問題上的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給了一個打擊，並答應將來另作一文來說明這個問題。同時，列寧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人彙刊』底編輯部，曾拒絕登載布哈林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理論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布哈林也發表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列寧死後，布哈林就發表了這篇文章，把它登在一九二五年的第一期『革命與法權』這個彙刊上面，並特別附上註釋，在這個註釋中說道：『讀者

不難看出，我沒有犯過人家說我犯的那種錯誤，因為我會明白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一方面，從列寧底短評中可以看出，他這時候對於炸燬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的論點會持不正確的態度，因把這個問題與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問題混雜起來。當列寧研究問題的時候，他關於炸燬的問題也得出了與我相同的結論。」

從這個註釋中十分明顯地可以看出：布哈林既責備列寧對「炸燬」國家的問題採取「不正確的」態度，既把自己放在列寧之上，可知在事實上，他在十月革命底經驗以後，在八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無產階級國家建設的經驗以後，仍擁護自己的舊主張。他仍舊把無政府主義者之「炸燬」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與馬克思主義者之「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兩者混為一談。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全會上「論聯共黨內的右傾」的演說中，在說布哈林是一個理論家的時候，會詳細估計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並萬分清楚地指出：布哈林的立場與馬克思列寧對國家的態度，兩者完全不可調和。斯大林同志說過：「這裏的問題就是：照布哈林（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思，工人們應該特別表明自己在原則上仇視一切國家，就是說也仇視過渡時期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請你們去嘗試一下，告訴我們的工人聽吧：工人階級應該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種國家。布哈林在其「青年國際」雜誌上一篇

文章中所站的立場，就是否認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國家。這裏，布哈林忽略了一了「壞事」，就是說他忽略了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如果真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它就不能不有自己本身的國家。這是第一點。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其批評中沒有講到「炸燬」「取消」一切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講到了這個理論，而且從上面我所舉的幾段話裏可以看出，他還批評了這個理論，認為這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建立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這個理論來與它對立。最後，決不能把「炸燬」國家這個無政府主義理論與「打碎」「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爲一談。有些同志企圖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爲一談，認為這兩個概念表現同一的思想。但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完全是不對的。當列寧批評「炸燬」及「取消」一切國家這個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時候，他正是以「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爲出發點的。」（見斯大林「論聯共黨內的右傾」）

斯大林同志在估計上面所提及的布哈林那段註釋（一九二五年『革命與法權』彙刊上一篇文章底註釋）的時候，曾說過：「他（布哈林——編者註）會這樣打算：從今以後，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創造者，或至少是它底指導者，應該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了。」

「直到最近，我們始終認爲自己是列寧主義者。而到現在，列寧也好，我們（列寧的學生）」

也好，原來都是布哈林派。同志們，這倒有些可笑。可是布哈林要大吹法螺，又有什麼辦法呢。

（見斯大林『論聯共黨內的右傾』七六頁）

在這篇演說詞中，斯大林同志從列寧底『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這本記錄簿上引了一段話，由這段話，可知列寧會認爲與布哈林對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鬭爭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這本記錄簿上，列寧會寫道：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現在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專政』）都利用國家——這兩點對於現在的實際工作是極重要的（這兩點布哈林却忘掉了！）。

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了解下面這些更深刻『更永久』的真理：國家帶有『臨時』的性質，『空談』國家是有害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的性質，國家與自由之間存在着矛盾，『公社』這個觀念（概念、名詞）比較國家這個觀念更爲確當，必須『打破』官僚軍事機器。還不應該忘記的就是：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考爾勃等人）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的黨綱和考茨基則間接加以否認，在日常的鼓動中不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並容忍考爾勃之流的叛變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會對布哈林寫過：『讓你的國家觀成熟起來吧』。『可是他自己呢，却不讓它成熟，就以『Mott-Bead』這個匿名出面而發表出來。他這樣做，結果沒有揭破考茨基派，而反

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而按實講來，布哈林要比考茨基近於真理。」（『列寧文存』第十四卷，『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二五六至二五九頁）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舊曆二月十七日）列寧給郭倫泰同志的信中，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我正在準備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態度的問題的文章（材料差不多已經準備好了）。我所作的結論，反對考茨基比反對布哈林還更厲害（我們已經讀過第六期『青年國際』雜誌和第二十一期『社會民主黨彙刊』上「Krafont」的文章）。問題極端重要：布哈林要比考茨基好得多，可是布哈林底錯誤，可以葬送他這個反考茨基主義的「正當事業」。」（『列寧文存』第二卷，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這樣看來，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及對於機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批評，只幫助了考茨基派俗化並抽空馬克思主義底內容，這樣也就是給了反考茨基主義的鬭爭以莫大的害處。

從上面所引的列寧致郭倫泰的信中的一段話裏可以看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舊曆二月十七日）的時候，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態度問題」，即「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底「材料差不多已經準備好了」。這種「材料」也就是上面所屢次提及的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那本記錄簿。二月革命使列寧暫時停頓了最後整理這種「材料」的工作。只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

變以後，當列寧因臨時政府下通緝令而避匿於拉士里夫車站附近茅屋裏面的時候，他才開始整頓他那準備好了的材料，開始是在茅屋內，後來是在赫爾森法斯。在赫爾森法斯，他就寫成了這部在理論上政治上具有偉大意義的著作——『國家與革命』。

可是列寧還是不能完全寫完這部著作。寫到說明一九〇五年革命經驗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經驗的那一章——第七章的時候就中斷了。繼續擴展的革命中斷了這個工作。

列寧打算以後再繼續這項工作，再分析俄國革命底經驗，作爲『國家與革命』一書底第二部。可是革命鬪爭正非常緊張，他忙於解決其他更迫切的問題，所以來不及完成預定的計劃。

(二) 資本家底強大的組合——托拉斯和新迪加，是由財政資本（就是說，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之融合）經過銀行而領導和指揮的，此等聯合機關底壟斷（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中獨佔的或幾乎獨佔的統治），就是帝國主義底最重要的特點。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我們應當把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分別清楚。在無產階級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例如私人向國家租借的企業，租借地），它們由無產階級的政權來調節，而有利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的企業，或者是整個的經濟部門（例如鐵路），它操在資產階級國家手裏，換言之，即操在資產階級整個階級手裏，最後，或者是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

的工業、農業、商業，它們由資產階級國家來調節，而有利於這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候，各交戰國底資產階級利益，需要這樣的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之調節，使生產和分配受「保護祖國」一達到最後勝利的戰爭」之需要所支配，以達到每個參戰國底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所立定了的那些強搶的掠奪的目的。生產和分配之此種國家的調節，列寧在本文上即稱它爲「由壟斷資本主義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

(三) 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是個唯心主義者，他發揮了辯證法的學說。只有馬克思把他的辯證法變成了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將他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而與恩格斯共同創造了辯證的唯物主義。黑格爾一般地是唯心主義者，而在他的國家學說上，仍舊是唯心主義者。按黑格爾底學說，道德是天賦與人們的。人們不能創造道德，而是不依人們爲轉移的道德自身，寄託於人們底一般的意識中，而爲特殊的道德規律。這個規律的自身，又是「絕對精神」、「絕對理性」(它是構成整個宇宙底基礎)之表現，並且要求一切人們要絕對服從這個規律。國家就是這個道德規律底產物——它的大成。按黑格爾底學說，不依賴人們而獨立存在的道德觀念，是具體地實現於國家中。因此，據黑格爾底意見，不能把國家看作爲個人、社會組織或階級利益之工具。

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和盧騷底資產階級學說相反，盧騷生於黑格爾之先，他把國家看作爲人與人間之「社會契約」底結果，而「社會契約」是表現個人意志底總和。盧騷底國家學說，固然

是失了國家底階級觀，不把國家當作是階級統治底組織，但是他的學說，在當時畢竟是革命的，因為按照他的學說，國家是人們自身底創造，而且能由人們自身來改變。然而，根據黑格爾底學說，這是不可能的；國家依賴着處於人們底影響之外的絕對精神，絕對理性，且爲這個「絕對精神」底表示和顯現。

(四) 法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君主專制政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在法蘭西大革命（一七八九年）之前，是由封建轉爲資產階級制度之過渡時期底國家。在封建社會範圍內發展了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一年強過一年。靠農奴制的剝削農民爲生活的封建主（地主）本身，往往在財政上是依賴那鞏固起來的資產階級的。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地主階級），處於彼此勢均力敵的地位。資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把政權奪到自己手裏來，而經濟上已經減弱的封建主，又不能獨立統治起來。實際上仍舊是地主式的國家政權，不能不聽資產階級底強硬要求，並在相當的限度內滿足它的要求，以保證自己封建主階級（地主）底利益。但同時國王只是封建主中最大的封主，他依靠封建主而壓制資產階級，部分地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維持國家機關的經費；當國主要影響那些企圖限制國王行動的封建主時，他自己又依靠於資產階級。

君主專制政體底這種情形，給人一個外表的根據，去這樣推論：國家政權站在交戰各階級之

上，它之于與它們的鬭爭，僅僅爲調和它們而已。可是事實上，君主專制政體會爲崩潰的封建階級底國家。資產階級一經強固起來。它就打倒君主專制政體，而建立自己的階級國家（如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大革命就是）。

法蘭西第一帝國時代，就是拿破崙第一掌握政權的時候，它在階級鬭爭中之相爭勢力底平衡，以及國家政權之表面上不依賴統治階級這個意義上，也是很特別的。法蘭西大革命始初（一七八九年）將政權分給資產階級，在革命繼續發展中（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轉爲革命小資產階級專政，而以雅可賓派爲其代表者。資產階級推翻了這個專政，復得了政治統治，但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以及工人階級（不錯，工人階級當時還是薄弱的）之不滿，繼續危害了這個統治的穩固性。當時應當掩蔽這個統治，而且要這樣掩蔽，以保障鎮壓一切不滿的社會階級的反抗，同時要使這個不滿不至連累資產階級。爲此之故，資產階級將政權委託與拿破崙第一，後者便成爲法蘭西底皇帝。拿破崙帝國消滅了代議制，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權利表面上似乎受了相當的限制，其實它完全爲着鞏固大資產階級——工商業和財政資產階級底地位而出力。它使工人完全無權，而剝奪其組織之最後的權利。它保障了農民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土地，而作他們的私有財產，因此它在受騙的農民羣衆中有很大的名望；在這些農民羣衆看來，他們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是與拿破崙底名字有着連帶關係的，其實帝國所施行的政策，僅僅幫助了鄉村中日益

發展的資本主義的上層份子，帝國借助於這些上層分子而欺騙農民羣衆。這樣一來，拿破崙主義利用了國家政權以鎮壓不滿意資產階級制度的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並且鞏固大資產階級底經濟和政治地位。

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從一八五一到一八七〇年的法皇拿破崙第三）產生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大致說來，它是代表大的財政資產階級底利益的。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已經長大了和強固了的法國工人階級，曾在巴黎實行企圖用暴動來奪取政權。這個企圖會沉沒於工人底鮮血中（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事變）。資產階級得了勝利了，但是，它要鞏固自己的勝利，——如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革命中之鞏固對雅可賓派的勝利一樣，——只有改變其統治底形式，以及再把政權委託與『皇帝』——即拿破崙第三（其詳情見本書註八），才有可能。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經說過：『當資產階級已經失掉管理民衆的能力，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獲得這個能力的時候，此時帝國是唯一可能的管理形式。』（馬克思：『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

帝國取消了代議制，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政府不依賴資產階級，其實帝國是爲着鞏固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底利益。帝國與農民羣衆吊膀子，可是它僅僅爲鄉村富農，保皇派的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富農利益而已。拿破崙主義用鼓惑爲護符，在表面上似乎爲各階級謀利益，其實它僅爲着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底上層分子而服務。

在德國歷史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這個時期，俾斯麥會爲德國政府底元首，從政府之表面上不依賴交戰各階級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時期也是很特別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德國資本主義底發達，已經開始迅速前進了。日益鞏固的工業資產階級。已經力圖要得到政權。依靠地主和代表地主利益的俾斯麥政府，會想減弱資產階級底這個壓制。爲此之故，政府決定實行變更選舉權（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盡量擴大選民底範圍，以減弱資產階級在立法機關中的地位。俾斯麥政府，且曾企圖用和工人運動底幾個領導者（拉沙爾）吊膀子的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竭力鼓勵工人階級使其發生一種空想，以爲在地主底政治統治之下，有改善它的地位的可能。這樣，政府就造成了非階級的政治底外表，力圖減弱工人運動，限制工業資產階級底地位，鞏固它所代表的大地主底地位。

（五）恩格斯是指「德國社會民主黨」而言，當時該黨是國際工人運動之最強的隊伍。

（六）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以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時候，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之作用，顯然是出賣勞動者底利益之一個異常顯著的例子。

一八四八年路易·勃朗會爲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下的「爲工人而設的政府委員會」底主席。他的「活動」就在於：用一切方法企圖引誘工人離開爲政權而作的鬭爭，散佈一種幻想，說似乎資產階級政府可以保障他們的利益。路易·勃朗鼓吹用和平方法建立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共和

國」，同時號召工人不要作革命鬪爭，而完全相信臨時政府中工人代表之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樣他就保證了統治的資產階級有行動底自由。

及後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時候，路易·勃朗與撲滅公社的樣也爾底政府，同處於凡爾賽。當資產階級實行摧殘革命的巴黎時，路易·勃朗鼓吹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底利益一致，這樣他就幫助了資產階級拿「法國全體人民」底名義去掩飾對「巴黎公社」社員的屠殺。

(七)列寧此處是指所謂「內閣主義」，就是說，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一個思潮，這個思潮是擁護和實際上實行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主張的。首先實行這個思潮的，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米萊蘭，一八九九年他藉口必須保護共和國以防止保皇派的運動，遂與「巴黎公社」底有名劊子手卡利孚將軍一齊加入政府，任總長之職。

自從米萊蘭加入政府之後，在其他各國也有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事實。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西歐大多數社會主義的政黨，變成了社會國家主義的政黨了，而米萊蘭主義便風行一時。此時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蓋德（他在一九〇〇年會反對社會主義者之加入資產階級之內閣）本人也做了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底總長。在現時，「社會主義者」（社會法西斯蒂）之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變成了一個系統，是為他們替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鬪爭而服務的形式之一。

(八)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手裏。這次革命底特點，就在於，工人階級第一次在此革命中拿出自己本階級的要求而作了鬭爭。這指出了工人階級之異常的長大，並且替資產階級指示了對它的統治有直接的危害。因此，自由資產階級底政府會把懲治革命的工人階級，作爲自己的基本的直接任務。在巴黎有名的六月屠殺中，資產階級實現了這個任務，此時工人階級底暴動，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爲奪取政權的暴動，已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在六月的屠殺之後，工人底不斷增長的騷擾告訴了資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制度之直接危害，並沒有消滅。因此，在六月屠殺之後，很容易將一切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成爲一個「秩序黨」，一個聯盟，以達到一個共同的利益：鎮壓工人運動和鞏固資產階級的制度。各色各樣資產階級受了工人階級暴動底恐嚇，尋找了建立鐵手般的政府——即「秩序」底組織者。同時資產階級在鄉村富農中，在願意維持資本主義秩序之堅固的富農中，找到了特別有力的支柱。受富農影響的多數農民，投票贊成了「強硬手段」。資產階級用鼓惑的方法，又把大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它害怕工人革命之危及私有財產底消滅）牽到自己方面來了。在此等條件之下，資產階級最初能够用普選制以掩飾其反革命的設施，如此便造成了「全民意志」底外形。在短時間內，以大總統爲元首的國會的共和國，會爲國家政權底形式，而拿破崙第一底姪子路易·波拿泊（即拿破崙第三），當時會當選爲大總統。但是，這僅僅是建立君主國的第一步；爲摧殘工人階級，爲施行

階級的恐怖起見，就必須使「鐵手」底政權大大地鞏固起來。資產階級底走狗，路易·波拿泊大總統，依靠軍隊，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號，得了資產階級本身的許可，完成了政變，驅散了立法會議，並且替自己鞏固了大總統的權柄至十年之久。自從政變之後，在對工人階級施行公開的階級恐怖的條件之下，路易·波拿泊自號爲拿破崙第三大帝。存在到一八七〇年九月的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樣就成立了（關於第二帝國的詳情，可參看本書註四）。

（九）法國路易十八和卡爾第十底合法帝制，存在於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自從法國拿破崙第一顛覆之後，被十八世紀末的革命所驅出國境的貴族地主，得了歐洲各反動政府之助力，重新恢復了政權，同時又恢復了布爾蓬底舊王朝。這是白色恐怖時代，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革命改造被消滅的時代。在復辟時期，合法帝制不能消滅革命之基本的社會經濟的改造——恢復鄉村中的農奴關係和城市中的行會制度。但是，這個帝制底政治，是受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革命所推翻了的地主底利益所支配的（別的不提，只講一點：地主們曾得到了十萬萬佛郎的補償費，作爲對他們在革命中的損失的賠償）。在某些條件之下，在這個時期，曾允許了資產階級底上層分子，它的貴族，去參加政權。由上「恩賜的」憲法和對民族工業之保護，替合法帝制造成了對這些上層分子之幫助。但是，工黨資本主義在法國得了大大的勝利，資產階級及其上層分子，也鞏固起來了，它自己能够奪取政權，並且對布爾蓬帝制立於反對的地位。農民之不可調和的仇恨地

主，城市手工業者 and 無產者之日益增長的痛苦，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小資產階級之反對態度，最後，工業資產階級和現存的政權間之衝突，——所有這些，告訴我們，爲什麼到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的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卡爾第十堅決地企圖取消甚至於憲法底外形，並想恢復爲一七九三年革命所殺了的路易十六時代底秩序。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就是廣大羣衆對卡爾第十此種企圖之答覆。在七月的事變中，暴動的民衆在巴黎戰勝了政府的軍隊，卡爾第十逃走了，而「合法的帝制」遂讓位與資產階級的帝制了。

七月帝制，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存在於法國。在這個資產階級的帝制中，佔了統治地位的，不過是資產階級底一派，資產階級底財政貴族，——「銀行家，交易所和鐵路大王，以及和他們聯合的一部分土地佔有者；煤礦，鐵礦和森林底領有者」（馬克思）。『市儈大王』——路易·菲利潑——率着資本家意志而掌握了政權。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時民衆所已得的勝利被人奪去了，這因爲民衆之組織性底薄弱以及共和派資產階級之背叛的緣故。在七月帝制底時期，在法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在四十年代中，工廠和機器，在法國的工業中心已經鞏固了起來。大部分的農民都處於高利貸者底束縛之下。不久在工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之間，發展了殘酷的鬭爭，以取得對工農羣衆之剝削的優越權。對於企業家必須有農民之大批的無產階級化，將他們從土地上驅逐出來；高利貸者和銀行家幻想把農民束縛於他們一塊不足餬口的土地上。小資產階級

不能參與政權，僅僅殷實的私有者享受了選舉權。所有這些，發展了國內種種促進新革命成熟的矛盾。在這個時期中，無產階級有了特別大的意義；由於工廠工業之發展，七月帝制時期會爲工人運動增長底時期。至一八四七年國內的社會矛盾，已經充分成熟，而新的革命，也就必不可免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七月帝制底命運遂宣告終結了（參看本書註八）。

（一〇）馬克思認爲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只有經過暴力革命，才有可能，這是一個通例；但是，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對於單個國家，他認爲有政權之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之可能。一八七四年他在海牙的演說中，曾指出英國和荷蘭就有這種可能性。恩格斯在自己的小冊子『法德農民問題』中也提到馬克思底話：『如能向所有這些匪徒去贖買出來，那對於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就是說，從資產階級手中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的生產手段。不消說，所有這些假設，現在都已失了効力。

（一一）培恩斯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的領導者之一，還在一八九七年，他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雜誌『Der Zeit』（『新時代』）上發表多篇論文，題爲『社會主義底問題』，在這些論文中，重新審查和『修正』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基礎。培恩斯坦否定了資本底集中化、階級矛盾底劇烈化，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底必然性，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同時他斷定說，用改良的方法，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地改造爲社會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可以

和平地「生長」成爲社會主義。

一八九九年出版了培恩斯坦底書：「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該書是一切修正派之政綱——「聖經」。國際社會民主派中因培恩斯坦的議論，發生了極大的爭辯，結果分成兩派，一是正統派，即馬克思學說底澈底的信徒，二是修正派，其思想上的首領即培恩斯坦。當時考茨基是站在正統派方面的，但是他對於培恩斯坦的批評，恰恰在暴力革命和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也是機會主義的批評，是污辱馬克思學說的批評。關於這一點，列寧在本書第六章中已明白的分析了。

(一二) 蒲魯東是無政府主義底鼻祖，他曾擁護個人的「勞動私產」。他認爲工人階級底解放就在於保證每個工人佔有生產工具和他的勞動底產品。蒲魯東和他的信徒認爲應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之將來的社會，就是小生產者私有主之協作聯合底社團。他們認定了，過渡到這個社會的方法，就是向大私有者和平贖買生產手段。

蒲魯東主義者否認了以暴力剝奪大私產之必要，同時否認了無產階級之利用國家作爲鎮壓剝削階級的工具之必要，否認了政治鬭爭之必要。馬克思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相反，他們認爲：工人階級爲要得到解放，只有消滅階級及其基礎——私有財產；要達到這個目的，其方法就是無產階級之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家的私產和使之逐漸社會化，就是說，把

一切的生產業手段轉給受調社會主義的社會手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理論，反之，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就是固守私有財產以及僅僅不滿意大資本底統治之小資產階級底理論。

(一三) 中世紀時代在意大利和法蘭西，市民稱自己的享有自治權的城市社團爲公社。有些地方，市民用直接征服封建主的手段而取得這個自治，有些地方則用收買的方法。

(一四) 一八七五年五月五號馬克思給白拉克的一封信，名爲「哥達綱領批評」，在該信中把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至十五號在哥達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底綱領，加以嚴格的批評。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主義者兩個派別——機會主義者拉沙爾派和馬克思主義者愛森拉赫派——聯合而爲「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了。這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綱領，是拉沙爾派和愛森拉赫派之妥協，該綱領正式存在到一八九一年愛福特代表大會爲止，在愛福特代表大會上會通過新的綱領（「愛福特綱領」），該綱領又引起了恩格斯底批評。

(一五) 反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令，在德國施行了十二年之久；從一八七八到一八九〇年。該法令之施行是以鎮壓日益發展和日益深入的工人運動爲目的的。該法令褫奪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政治權利。警察機關得了禁止工會、禁止一切的結社和出版物之權。該法令又授權與警察，得禁止集會，禁止爲社會主義目的而收集會金等等。凡違犯這些禁令者，均被監禁於獄中。警察得有逐人出境之權，中央政府得有在單個城市和單個地方宣佈戒嚴之權。

但是，該法令不能不打破德國的工人運動，不管一切的鎮壓，社會民主黨仍繼續生長着和鞏固着。可是，假使說，在鎮壓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令存在的條件之下，一方面，經過了十二年的鬭爭之後，社會民主黨是鞏固和生長了。那末，他方面，黨內許多領袖們走上了機會主義底道路，企圖在法律範圍內去提出黨底要求和進行黨底活動。恩格斯在本文內也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

（十六）『由上而下的革命』，就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和七十年代初葉地主國家底政策，該政策是在俾斯麥領導之下所施行的，其目的實際上是爲鞏固普魯士地主的帝制（參看本書註四）。

業已強大起來的德意志資產階級，曾竭力企圖達到政治上的統治。達到了統治德意志其他各個國家之翁克（即地主）式的普魯士，曾想鞏固地主底勢力來反對發展着的資產階級底勢力，並想建立集中的德意志國家而以普魯士爲其盟主。俾斯麥企圖達到這個目的，其所用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和德意志的中小國家吊膀子，答應減輕它們的預算案，把許多用費底負擔加在全德意志的預算案中，他方面，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施兩面的手腕。資產階級所得了的保障，就是施行種種的改良，以掃除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障礙。無疑地，德意志底統一，雖然在翁克式的普魯士領導之下，而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正因爲它促進了德意志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而資本主義之

發展，又被俾斯麥底政府所利用而滿足地主底利益，地主本身又以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經營自己的經濟了。同時俾斯麥又對無產階級玩手腕，他擬定施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積極的選舉權，並且答應工人有結社底自由。特別要指出的，是俾斯麥會對「全德工人聯合會」玩手腕；領導該聯合會的是拉沙爾，以後是他的信徒。這個政策底結果，就是以普魯士君主爲首的「德意志帝國」底建立。不管俾斯麥底反動政策，而無數小國家之統一爲一致的集中的聯合的國家，對於德國經濟之往前發展，無疑地起了進步的作用。

(一七) 布爾塞維克會指定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號(十號)舉行和平的反抗示威，以反對臨時政府之延長戰爭的政策。當時所開的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其中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佔多數)禁止了這次的示威。蔡雷特利是最有名的孟塞維克之一，護國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首領，他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團底會議上發言，主張解除工人底武裝。他說：「和布爾塞維克鬭爭，所要用的，不是空言，不是決議案，而是應當奪奪他們手中所有的一切技術上的工具。」列寧說過，蔡雷特利這個言論，是「歷史的和神經錯亂的」，其令人注意的地方就在於：它證明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顯然過渡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他們開始公開進攻工人階級。

列寧把蔡雷特利在解除工人底武裝上所起的作用，和法國軍官加文亞克底作用相比，加氏在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後曾任法國陸軍總長，在同年六月事變中他撲滅了巴黎工人底暴動。

(一八)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號，社會民主黨團在德國國會中會投票贊成給政府以戰爭的借款。哈薩代表社會民主黨團底名義去宣讀宣言，最後他說：「我們要投票贊成政府所要求的借款」。當時只有李卜克內西一人發表了反戰爭的宣言，而且在投票的時候他退出了國會會場。

這樣看來，在「第二國際」內人數最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戰爭一起的時候，其中絕對大多數（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梅林底集團——「國際團」或「斯巴達團」，不在此例）都變成它的祖國底保護者，就是祖國資產階級底保護者。列寧所說的它的可恥的破產，也就在此地。

(一九) 列寧是指在民族自決權的辯論中擁護錯誤觀點的人而言，這個辯論發生於一九一六年，復起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黨的代表會議上。在一九一六年的辯論中，反對列寧的，曾有西歐社會民主黨底「左派」——拉狄克、盧森堡、班業吉克、黑格龍。在這次辯論中，從俄國布爾塞維克隊伍中有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底集團起來反對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詳情，可參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九卷中的文章：「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關於民族自決的問題底辯論總結」第十章：「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第五章，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說。

(二〇) 希洛克是沙士比亞底悲劇：「威尼斯的商人」中的主角，是一種吝嗇的殘酷的高利

貸者。舉例來說，希洛克對於自己的債務人不作任何的讓步，如果債務人不按期償還債款，那末，他就根據契約要求從債務人身上割「一磅肉」。



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

30

基本定價

\$ 5.80